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亨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80 期
2011 年 2 月 15 日

目 录

【译 文】

共产主义中国之前的国民党、穆斯林军阀
和“开发大西北”运动

林孝庭著 卢云译

【论 文】

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演化及其当代启示

黄达远

【调研报告】

新疆城镇发展和双语教育的进程

——南疆地区两个专题调研报告

马 戎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译 文】

共产主义中国之前的国民党、穆斯林军阀 和“开发大西北”运动¹

林孝庭著 卢云译²

摘要：本文回顾了一个过去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民国时期（1928-1949）中国国民党向穆斯林统治的中国西北边疆的战略性进军。本文展示了最初虚弱的、只统治局部区域、以及战事不断的国民党政权是如何缓慢渗透进中国内地边疆的，南京政府虽然经常宣称对西北边疆拥有全部主权，但其行政命令在该地区是无效的。本文也显示了以国家建设和巩固政权的名义，国民党是如何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在中国边疆建立起以往不存在的权威。正如本文证明的，国民党政权在中国西北边疆的扩展，以及后来 40 年代国民党政权在该地区的巩固发展，意外地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接管该地区铺平了道路。

关键词：国民党 新疆 中国穆斯林 马步芳 盛世才 开发大西北

在 1999 年 9 月，中国政府宣布了西部大开发的宏大工程。这项事业的主要目的是促进 1978 年以来在全国经济发展中落伍的中国西部内陆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根据“依靠发展来促进稳定”的战略，北京通过在遥远广大的西部边疆发展区域经济、促进商业发展和国外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来保护国家统一和巩固边境安全。这个雄心万丈的工程几乎一夜之间就激发了普遍的兴奋和关注。尽管政府官员毫不犹豫地强调“向西部”发展对维护中国边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但西部地区的居民普遍盼望着未来的投资能够带来更好的工作机会。另一面，西方国家政府和私人部门很快表示赞成该项目，因为它们用现代化和改革的话语来制定目标。而在学术圈里，学者们则激烈地争论着西部大开发是否徒有其名。³

开发西部绝不是一个新概念。当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中探究西部开发的议题时，我们发现在 1949 年以前的国民党执政时期（1928-1949），国民党当局已经努力着手一系列的“开发大西北”项目，其目的在于推动西北边疆的对外开放、充实人口和现代化。这个发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努力虽然有些被遗忘，但其在内容或范围上同当前方案一样雄心万丈和积极进取，曾经也激起了同当前一样的巨大期望和全国性轰动。

是什么因素促使政治权威仅限于中国本部的国民党发动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国民党是如何应付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大部分时间都有效统治了广大西北边疆的中国穆斯林军阀？这些发展西北计划的后果是什么？而更重要的是，以一个更宽广的地理-历史视角，国民党政府的西北开发工程对 1949 年后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回顾了前共产主义中国时期西北边疆的发展过程，并试图揭示中国国民党在穆斯林统治的西北边疆伺机而动的进军过程。本文展示了虚弱且战事不断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如何缓慢地渗透

¹ 本文英文题目为“Nationalists, Muslim Warlords, and the ‘Great Northwestern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刊载于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Volume 5, No. 1 (2007), 第 115-135 页。

² 作者林孝庭博士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译者卢云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³ 有关自 20 世纪 90 年代底开始的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研究文献，可以参见：Yasuo Onishi ed.,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Issues and Prospects* (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2001); Abigail Sines, “Civilizing the Middle Kingdom’s wild west,” *Central Asian Survey* 21, 1 (2002), pp. 5-18; Ding Lu & William A. W. Neilson eds., *China’s West Region Development: Domestic Strategies and Global Implication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2004).

进中国内地边疆，国民党政府虽然宣称对西北地区拥有全部主权，但其行政命令在该地区却是经常没有效力的。本文也显示了，以国家建设和政权巩固的名义，国民党是如何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在中国边疆逐步建立起了最初不存在的权威。正如本文将证明的，国民党权威在西北边疆的出现，在 1949 年后讽刺性和意外地为后来的共产党接管该地区铺平了道路。

寻求新的权力基础

1931 年 9 月，驻扎在韩国的日军在其指挥官命令下跨过中韩边界进入满洲南部并进攻在沈阳的中国军营。满洲的中国军队在年轻的张学良元帅指挥下没有给予日军太多抵抗，到 1931 年底整个地区完全被日本控制。1932 年春，由日本支持的满洲国成立，前清皇帝溥仪成为其名义上的统治者。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紧接其后的是中国与日本在上海的另一次军事冲突。1938 年 1 月 28 日，以保护租界为借口，驻扎在上海国际租界的日本海军突然与附近的国民党军队交火。这场出乎预料的小冲突很快演变成日本对上海的全面轰炸和进攻。虽然停战协定于当年五月达成，但国民党政府被迫接受在大上海附近划出一片中立区，中国军队必须撤出该地区。¹

由于日本对满洲和中国其他沿海地区的急剧军事扩张，国民党最高层开始为如何确保政权安全和生存而焦虑。30 年代初期的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事变之后，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员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似乎在将来不可避免。因此，国民党高层领导者迫切地认识到有必要寻找一个内陆权力基地，以承担长期抵抗日本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在 30 年代早期，吸引国民党高层注意的是西北地区，而不是后来被国民党确立为战时陪都的西南地区。日本入侵上海后，国民党立刻宣布了中国的首都暂时从靠近上海的南京移到河南省的洛阳。虽然停火协定在上海缔结后，中央政府活动逐渐回到了南京，但陕西省首府西安被官方确立为中国的“西京”，一旦沿海战事再起中央政府将会迁到西安。²

除了国民党政府高官，中国本部的普通汉族民众和大众媒体也很快意识到了，在面临日本军事入侵的情况下开发大西北的战略需要。这一社会意识很明显地在逐渐增长，各种关于中国西北事务的社团、研究团体和出版社在九一八事件后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仅 1932 年一年，至少有 12 家有关西北事务的新社团在北京、南京、上海成立，每一家都致力于研究中国的西部边疆。这些团体出版他们的杂志和期刊，向中国本部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系统地介绍中国西北区域。一些组织良好的团体，例如上海的西北问题研究会，不仅吸引了学者和学生，还吸引了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例如当时的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有很大影响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张继。上海的西北问题研究会逐渐成为国民党政权就西北事务的重要的顾问委员会。³

30 年代早期灾难性的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事件发生后，中国社会舆论催促中央政府采取切实措施把西北边疆纳入南京的行政控制下。社会舆论同样也提醒中国本部民众开发西北对维持民族生存的重要性。以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天津《大公报》为例，1932 年 4 月 26 日其社论指出，开发

¹ Lloyd E. Eastman, Jerome Chen, Suzanne Pepper and Lyman van Slyke,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4, 120;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90), pp. 388-396.

² “Important resolutions approved in the 4th KMT Central Committee”, March 1932, in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ed., Zhonghua Minguoshi Dang’an Ziliao Huibian* 《中华民国史档案汇编》(Collection of Republican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archives) (hereafter, ZMDZH) (Nanjing: Jiangsu guji chubanshe, 1994), 5: 1, Politics (2), p. 365.

³ Shen Sherong, “Jiu-yi-ba Shibian Hou kaifa Xibei sichao di xingqi” (The rise of the trend of thought on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after the Mukden incident), *Ningxia Daxue Xuebao* 《宁夏大学学报》(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Ningxia) 4, (1995), pp. 9-15. 该时期其他重要的研究西北事务的社团包括 the Northwest Association 西北协社(Xibei Xieshe) and Society for the Northwest Public Studies 西北公学社(Xibei Gongxueshe) in Beijing, the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Association 开发西北协会(Kaifa Xibei Xiehui) in Nanking, and the Northwest Public Forum Association 西北公论社(Xibei Gonglunshe) in Shanghai.

西北是面临战争的中国的唯一出路。这一论断，以及后来的社论，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由于满洲的沦陷，中国本部不能得到安全保护。《大公报》同时指出，对国民党来说开发西北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西南地区受到地方军阀无止境的战争的困扰，这些军阀只在表面上宣布效忠南京的中央政府。¹

为了响应民众对开发西北的高度期望，1932年底国民党中央颁布了一系列的建议，旨在推动中国西部边疆在经济、工业、林业、灌溉、农牧业和采矿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这个新规划，一个负责相关事务的具有部级地位的开拓委员会（Reclamation Committee）将很快建立，并在行政院直接领导下。尽管财政紧张，国民党政权宣布将会有大量的国家经费划拨给新政府部门以支持其行动。²正如预期的，这份建议受到广泛的赞同和欢迎，并立刻被认为明确地展示了南京把西北切实转变为对抗日本的坚固权力基地的坚定决心。

但是，中国的社会舆论可能不经意地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国民党在西北的影响力同在西南一样虚弱。从19世纪晚期开始，甘肃、宁夏和青海等西北省份被当地的马氏穆斯林家族控制。马氏家族控制了中国的中亚地区，实际上，他们开始成为独立的小朝廷。从民国建立到20年代底，马麒和马麟兄弟控制了河西走廊和青海，到30年代其地盘被马麒的儿子马步芳和马步青控制。马氏家族的另一支占据了宁夏和甘肃南部：马鸿宾在20年代占据甘肃南部，在30年代早期成为甘肃省主席。他的表兄弟马鸿逵在宁夏当权，1931年成为宁夏省主席并统治了接下来的15年时间。³

马家地盘的西面是中国中亚地区的另一省份新疆。新疆是一个辽阔的、遥远的、人口分散的地区，在1884年著名将领左宗棠平息穆斯林叛变并收复该地区之前，没有被清政府设立为行省。当地在族群和文化上都很独特，生活着大量的非汉族族群，他们大部分都是穆斯林。新疆与中国权力文化中心的遥远距离，以及交流和交通的内在障碍，使中国统治者极难把新疆和其他地区整合在一起。在1921年到1928年，新疆在前清官员杨增新的控制下，杨增新虽然承认北京民国政府拥有主权，但他实际上不受北京的制约。1928年杨在新疆被政敌刺杀，不得人心的继任者金树仁的统治比杨更腐败和无效率。1928年以后，金树仁支配的省政府更不听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新政权。在1933年春，金树仁的统治被马仲英领导的穆斯林军队所颠覆，而马仲英是统治中国中亚其他地区的马氏家族成员。⁴

金树仁1933年飞离乌鲁木齐后，盛世才因为在军事上的强大所以掌握了权力，南京最终也承认他为新疆的新领导者。但是，盛世才同样也独立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不久，盛世才采取亲善苏联的政策，因为新疆在经济和交通方面与苏联更加紧密。苏联向盛世才政权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技术支持，而且不止一次地提供军事支持帮助其对抗中亚穆斯林敌军。盛世才从1933年开始统治这片广阔的土地。和他的前任一样，他只是在名义上服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政府。⁵

争夺土地与政治妥协

1 Editorial entitl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rthwest," 《大公报》 (*The Impartial Daily*) (Tianjin), April 26 1932.

2 "Outlines of the schem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west," Executive Yuan, dated December 19 1932, in ZMDZH, pp. 391-392.

3 有关中国西北马氏家族历史的研究文献，参见 Jonathan 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esp. chapters 4 and 5; A. Doak Barnett, *China's Far West: Four Decades of Change*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3); Qinghai Provincial Government ed., *Qinghai San Ma* 《青海三马》 (*The three Mas in Qinghai*) (Beijing: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 1988).

4 参见 Allen S. Whiting & Sheng Shih-ts'ai, *Sinkiang: Pawn or Pivot?* (East Lansing, Michiga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3-20; Colin Mackerras, *China's Minorities: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esp. chapter 4.

5 有关新疆共和主义历史的全面完整的研究文献，参见 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南京的蒋介石和幕僚们完全认识到，只要马氏军阀继续独立控制中国的西北地区，国民党将毫无机会来有效推行他们新提出的“开发大西北”计划，这一计划旨在把西北地区逐渐转变成国民党的权力基地。但是在1933年夏天，一个机会出现了，这是权力有限的国民党自1928年上台以来第一次有可能将权力扩展到马氏家族统治的西北。蒋介石的一个主要敌人冯玉祥为了打击南京政府的声誉，在绥远省组织了一支联合军队以对抗日本侵略。¹由于冯玉祥试图在中国西北建立对抗蒋介石的政治军事联盟，南京视其为威胁政治合法性的敌人，因此将不惜一切代价去镇压。驻扎在战略性的北京至绥远铁路线的孙殿英部仍然宣布效忠于南京政府，其此时对蒋介石集团非常关键。如果孙殿英加入冯玉祥的西北集团，南京将面临危险的境地。蒋介石认为有必要将孙殿英部离开这一危险地区，他以“殖民和开垦”荒地作为借口急令孙殿英部向西前往西北的青海。孙殿英认为这是蒋介石奖励他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所以立刻接受了命令。²

国民党政府的策略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可以使孙殿英部远离冯玉祥集团。另一方面，以“开发大西北”的政治口号，南京操纵孙殿英部去削弱马氏家族权威，然后在该地区建立自己的影响力。但南京的精打细算却遭到了几乎所有穆斯林军阀剧烈反对。当听说可能到来的孙殿英部有6万人之众，青海省主席马麟要求南京政府收回命令。马麟不仅唆使当地藏人和蒙古人向南京抗议，他甚至威胁要辞去青海省主席。³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宣称由于“宁夏严重的农业歉收和粮食缺乏”，他将不允许孙殿英部通过宁夏前往青海。和马麟一样，马鸿逵也威胁如果蒋介石不收回“错误的”命令他就辞去宁夏省政府主席的职位。⁴

因为面临穆斯林军阀的极大压力，权力有限但又秉持机会主义策略的南京政府决定放弃他们利用孙殿英作为渗透西北工具的企图。1933年11月，由于西北地区日益增长的骚乱，蒋介石最终退步。他命令孙殿英部缓慢地向绥远-宁夏边境移动，然后在那里等待南京的进一步命令。同时，孙殿英的部队陷入绝境并即将面临粮食短缺，已经士气低落而且显示出情绪不稳定迹象。⁵这一危急局面促使孙殿英最终自行其是。在1934年初期，孙殿英不顾蒋介石的公开命令，命令其部队西进穿越宁夏边界，因此立刻导致了与驻扎当地的马鸿逵穆斯林军队的军事冲突。为了保护他们在西北的共同利益，几乎所有重要的马氏家族成员都派遣部队增援宁夏对抗孙殿英部。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认识到无法再利用孙殿英来对抗西北军阀，他见风使舵地改变态度，命令马氏家族采取任何“必要措施”惩罚“顽固的”孙殿英。在这场军事冲突的背后，南京甚至向马鸿逵送去包括侦察机在内的精良军火，以帮助其对抗孙殿英。在三月，孙殿英的部队被击败并且最终并入陕西省卫戍部队。⁶

孙殿英事件对国民党政权的威信造成巨大损害。这次事件也促使南京高级官员们认识到，马氏家族在中国西北拥有稳固的权威，很难用军事方式将他们轻易征服。因此，蒋介石决定放弃使

¹ “China (Military): Situation Report”, received by the U. S. War Department, May 31 1933, in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 China, 1911-1941*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83), microfilm (hereafter, USMIR), reel 5.

² 参见 Sun Dianying's dispatches to Lin Sen (Head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Premier Wang Jingwei, June 17 1933, in *Minguo Dang'an 《民国档案》* (The Republican Archives) (Nanjing), 1994 (4), p. 27; “China (Military): Situation Report”, U. S. War Department, received July 19 and August 10 1933, USMIR, reel 9.

³ Ma Lin to Chiang Kai-shek and Wang Jingwei, June 30 1933; The Qinghai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July 2 1933; Ma Lin to Lin Sen, July 5 1933 in *Minguo Dang'an 《民国档案》*, pp. 28-29.

⁴ 参见: Ma Hongkui to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September 21 1933, and Ningxia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 the Executive Yuan, October 10 1933, in *Minguo Dang'an 《民国档案》*, pp. 33, 35.

⁵ Sun Dianying to Wang Jingwei, October 11 1933, in *Minguo Dang'an 《民国档案》*, p. 36.

⁶ 参见: Wang Jianping, “Xibei Si Ma Heji Sun Dianying di Huiyi” (A reminiscence of the joint attack on Sun Dianying by the four Mas of the Northwest), in ed., *Ningxia San Ma Government of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The three Mas in Ningxia)* (Beijing: Zhongguo wenshizhe chubanshe, 1988), pp. 169-180; Shen Sherong and Guo Yingchun, “Sun Dianying Tunkun Qinghai Wenti zai Renshi” (Reconsidering the issue of Sun Dianying's reclamation of Qinghai), in *Guyuan Shizhuan Xuebao* (Journal of Guyuan Teachers College) 5 (1998), pp. 18-22.

用极端方式，从此次事件后采取和平渗透来加强国民党的影响。¹另一方面，蒋介石在这次军事冲突中最终与穆斯林的妥协却带来意料之外的收获。当西北大草原尘埃落定后，马氏穆斯林军阀继续承认南京在名义上拥有主权。不仅如此，为了回报蒋介石放弃支持孙殿英，马氏军阀第一次公开宣称他们愿意接受国民党高级官员以检查和调查“开发大西北”项目执行情况为名义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²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从1934年春开始到年底，大量的国民党官方要员为了执行“检查”任务而频繁来往于南京和西北。1934年4月，蒋介石最信任的边界顾问戴传贤到达青海省会西宁，他是第一个到达此地的国民党高级官员。³紧接着，蒋介石的连襟，当时负责中国经济和财政计划的宋子文和孔祥熙也出访西北。宋子文特地巡视了马氏家族统治的整个地域，包括甘肃南部，青海省和宁夏省。宋子文在这些地方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会见了当地所有有影响力的地区要员。在宋子文西北之行结束不久之后，南京宣布全国经济委员会将在兰州建立一个分支机构，以执行该地区的发展计划。⁴同时，南京还热烈讨论了把中国本部过多汉族人口迁往西北耕作开垦的可能性问题。另外，国民党政府宣称有更多的财政资助分拨给马氏家族，但这将根据他们与国民党共同开发西北的合作意愿而定。⁵

在1934年秋，蒋介石亲自前往穆斯林控制的西北地区视察。尽管缠身于他近期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军事围剿，蒋介石还是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巡查西北和内蒙古的边界地带。在他停留在陕西、甘肃和宁夏期间，他公开表达自己把整个西北转变为中华民族生存的战略基地的决心。他呼吁同胞“向西部进军”，希望使国人意识到过去因忽视这片富饶土地所犯下的错误。同时，蒋介石煞费苦心希望使穆斯林军阀们相信与南京合作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希望他们准许国民党的资本、技术和南京任命的人员进入他们的辖地。⁶

从事后可以看出，1934年至1935年南京官员接连高规格的访问没有促使西北转变为国民党的后备权力基地。而且，也许国民党领导层在穆斯林统治地区的经历使他们认识到，中国西北地区由于严酷的气候条件、艰苦的生活环境和时有发生饥荒，的确不是抵抗日本全面入侵的理想后方。⁷但是，国民党官员对西北的访问以及政府支持的边界调查团队的派遣，立刻在社会上产生了如下认识：面临战争威胁的国民党政权确实致力于开发中国的西北边疆，国民党确实希望在西北建立更加牢固的统治。虽然国民党在该地区的权威仍然是脆弱的和徒有其名，但国民党对西北“名义上”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提高了其威信。⁸

¹ Yang Xiaoping, *Ma Bufang Jiazu di Xingshuai* 《马步芳家族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 Bufang family) (Xining: Qinghai renmin chubanshe, 1986), pp. 107-121; 《青海三马》*Qinghai San Ma*, pp. 200-201.

² Gao Yi, *Jiang Jieshi yu Xibei Si Ma* 《蒋介石与西北四马》(Chiang Kai-shek and the four Mas in the Northwest) (Beijing: Jingcha jiaoyu chubanshe, 1993), pp. 84-101; Hao Weimin ed., *Neimenggu Jindai shi* 《内蒙古近代史》(A history of modern Inner Mongolia) (Hohhot: Neimenggu Daxue chubanshe, 1990), pp. 120-129.

³ *Zhongyang Ribao* 《中央日报》(Central Daily) (Nanking), April 15 1934, p. 2; Dai Chuanxian's personal letter to Chiang Kai-shek, April 30 1934, in Chen Tianxi ed., *Dai Jitao Xiansheng Wencun Xubian* 《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The sequel of Mr. Dai Jitao's documents) (Taipei: Kuomintang Historical Committee, 1967), p. 176.

⁴ *Zhongyang Ribao* 《中央日报》，May 2, May 9, May 15 and June 22 1934; *Shen Bao* 《申报》(Courier Mail) (Shanghai), May 9 and 10, 1934.

⁵ Mi Zhizhong, "Jushi Zhumu zhi Xibei" (A Northwest that catches world-wide attention), in Tuo Huang (Reclamation) (Nanking) 2, 3 (1934), pp. 3-10; Zhang Naiwen, *Yi-jiu-san-liu Nian* 《1936年》(The year 1936) (Shanghai: Lehua shuju, 1936), pp. 293-299.

⁶ "China (Military): Situation Report," U. S. War Department, received September 26 1934, USMIR, reel 9; "Jiang Weiyuanzhan dui Ningxia Gejie Xunhuaci" (The Generalissimo's admonitory talk to all circles in Ningxia), in *Kaifa Xibei*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Nanking), 2, 4 (1934), pp. 1-3; "Jiang Weiyuanzhan Xunxing Gesheng houzhi Guangan" (Some thoughts of the Generalissimo after his inspection tour in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ibid.*, 2, 5 (1934), pp. 1-3.

⁷ Sheng Sherong, "Jiang Jieshi di Xibei Zhanlueguan" "蒋介石的西北战略观" (Chiang Kai-shek's strategic views on the Northwest), *Guyuan Shizhuan Xuebao* 1 (2003), pp. 53-58.

⁸ 中国媒体对国民党开发西北运动的积极评价，可参见：Da Gong Bao, the editorials for August 13 and 14 1936; Sheng Ran, "Xibei Jiaotong Jianshe zhi Wojian" (My opinion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facilities in the

打破穆斯林的阻碍

直到 1935 年蒋介石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中国西南地区以前，开发西北和把该地区转变为国民党新的战略基地的兴趣一直在中国本部广为存在。中国共产党在 1934 年底开始的长征，给蒋介石一个前所未有的将军事力量和政治势力插入西南省份的机会。为了追击撤退的共产党，蒋介石装备精良的部队进入湖南、贵州、四川和云南。由于极端惧怕共产党带来的威胁，当地独立的军阀们很不情愿地准许国民党中央军帮助他们驱逐红军。蒋介石充分利用了此次机会，在该地区开始了政权巩固和国家政权建设。一旦国民党中央军进入某个省份，南京任命的当地代理人就开始强制推行改革以打破本地区的独立。¹ 例如在四川，作为地方军阀们政治经济基础的防区被废除，代之以更加中央集权化的行政系统。大量公路建设项目被启动，旨在使该省在政治军事上与全国其他地区整合为一体。由于国民党法币的广泛使用，四川最终在经济财政上也纳入南京的控制。作为 1935-1936 年国民党剿共运动的结果，曾经政治上自治灵活的西南军阀们被急剧削弱，国民党中央政权的权力和威信得到加强。²

对西南地区的成功渗透使得国民党选择四川作为对抗日本侵略的内陆基地。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随着首都从南京迁往重庆，全国重心从沿海转到了西南。但是，穆斯林控制的西北地区对陷入战争困境的国民党政权仍然具有战略和军事上的重要性。在战争的最初阶段，苏联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向蒋介石提供实质性援助的国家之一，苏联的军事装备和其他必要的战争物资必须通过中亚才能运达四川。中亚连结着苏联和被日本包围的中国西南地区，因此其具有地理政治重要性，其对中国和国民党政权的生存安全非常重要。³

此外，在 1939 至 1940 年期间，在曾经名不见经传的玉门成功发现油田以及在青海和甘肃其他地区可能也会发现石油的新闻，增加了西北地区的军事、战略和士气上的重要性。到 40 年代初，对重庆的蒋介石和参谋人员来说，把马氏家族统治的西北地区纳入国民党的控制成为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国民党最高政治安全参谋人员秘密计划扩大青海、鄂尔多斯和阿拉善地区在战前已建立的地下情报单位，并考虑在云南西部、新疆北部、西康和西藏地区建立新的站点。蒋介石和军事参谋人员也在考虑向穆斯林统治的宁夏和甘肃交界处派遣国民党军队的可能性，以此作为控制整个西北的第一步。⁴ 很明显，因为蒋介石和其属下把政权安危作为首要关注，他们感到有必要在西部地区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方式来加强巩固国民党徒有其名的权威。

1942 年，重庆赶走了河西走廊的穆斯林军阀马步青，这是其在该地区第一次成功地建立起统治。和过去一样，精心策划的渗透战略，即使不是全凭运气，也是依靠机会主义才得以实现。陷入困境的马步青和其骑兵部队驻扎在其兄弟马步芳控制的青海和表亲马鸿逵控制的宁夏之间。早在 1941 年初，蒋介石就意识到马步芳与其兄弟马步青交恶，盘踞在河西走廊的马步青逐渐被马步芳视为家族内的竞争对手。蒋介石因此说服马步芳与重庆合作，帮助国民党控制河西走廊。

northwest), in *Bianjiang* 《边疆》(Frontier biweekly) (Nanking), 1 (1936), pp. 12-19.

¹ "China (Military): Situation report", U. S. War Department, received April 9 1935, USMIR, reel 9; Eastman et al.,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pp. 32-36.

² 有关南京政府加强对四川行政控制的研究文献,参见 Robert A Kapp, *Szechwan and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99-120.

³ Owen Lattimore, "China's Turkistan-Siberian Supply Road," in *Pacific Affairs* 13, 4 (December 1940), pp. 393-412; Martin R. Norins, "The New Sinkiang-China's Link with the Middle East," *Pacific Affairs* 15, 4 (December 1942), pp. 457-470. 有关中日战争初期的中苏关系的研究文献, 参见 John W. Garver,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⁴ 参见: The Kuomintang Party Archives 《国民党档案》(Taipei), Archives of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hereafter, ASNDC), 003/103, "The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 administrative schedule for the second stage of war", April 1939; Academia Historica (Taipei),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Archives, Choubi (Plans and Directives) (hereafter, CB), 08-0541, Chiang Kai-shek's instructions to Zhu Shaoliang (Commander of the 8th War Zone), January 23 1938; 08-1408, Chiang to Zhu, January 23 1939; 08-2298, Chiang's secret dispatch to He Guoguang (Director of the Generalissimo's Field Headquarters in Sichuan), January 20 1940.

作为回报，蒋介石答应帮助马步芳接管马步青的军队，并结束他兄弟在西北的军事政治生命。¹蒋介石还向马步芳承诺，只要完成他们的交易，重庆将会给予西宁更多的财政拨款。蒋介石还答应马步芳，国民党将很快向其青海的私人产业投资大量的资金。²很明显，马步芳对蒋介石的条件很满意。

因此，1942年夏天，蒋介石命令马步青将部队开往青海西北的柴达木马什去开垦和保护那里的荒地。³这很像十年前蒋介石给孙殿英下达的命令，但这次发生在一个相当不同的政治战略环境里。毫无准备的马步青被局势的突然转变所震惊，他立刻向其他马氏家族成员求助。正如蒋介石所料，他没有获得任何帮助。由于无法从青海的兄弟和宁夏的表亲那里获得支持，沮丧的马步青只能遵从蒋介石的命令。1942年夏天，根据当时呈交蒋介石的一份报告，马步青率三万名穆斯林骑兵离开河西走廊的军营，穿过祁连山到达青海西北。这次事件结束了马步青长达25年的叱咤风云。⁴在此之后，蒋介石嫡系国民党中央军立刻进入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通往新疆的河西走廊，戍守在黄河西岸的这片长条形土地。根据后来一位外国观察者的报告，“国民党部队驻守在每一个城市，甚至远至中亚沙漠里的居民点”。⁵

从河西走廊成功驱逐出马步青，以及成功打破西北穆斯林军阀联盟，使得自信满满的蒋介石于1942年夏再一次开始了对河西走廊和军阀统治的青海、宁夏的不切实际的考察。⁶在他访问这些地区期间，蒋介石再次催促这些顽固的穆斯林军阀与重庆坦诚合作，共同对抗日本。蒋介石还特地抽出时间前往青海拜访当地的穆斯林部落和蒙古、西藏的贵族，他们只是向中央政权象征性地进贡，而且有可能已经暗地与日本结盟。⁷在宁夏期间，蒋介石公开地呼吁当地穆斯林上层与国民党展开全方位的合作。他向省主席马鸿逵承诺，重庆将会给予宁夏更多的财政资源。作为回报，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该地区的军事政治事务上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⁸

毫无疑问，西北的马氏家族欢迎蒋介石中央政权的军事和政治援助。但是，国民党在西北地区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迅速增加，将不可避免地给当地穆斯林统治者带来压力。在蒋介石的考察结束之后，（为了监督当地事务，）国民党政府官员、军事顾问和政治组织不仅出现在国民党控制的河西走廊，也出现在青海和宁夏。著名的玉门油田已经完全被重庆任命的官员掌握。甚至在最遥远的中国和内蒙古边界的阿拉善旗，也驻扎着国民党委员会和蒋介石政府军事基地的一系列分支机构。⁹到1942年底，重庆的政治压力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顽固的穆斯林军阀马鸿逵被迫命

¹ Jin Shaoxian, “Yishu Guomindang Yuanlao Wu Zhongxin” (A memorial narration of the KMT veteran Wu Zhongxin), in *Wenshi Ziliao Xuanji* (Selections of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118 (1989), pp. 118-119.

² Yang, Ma Bufang Jiazou di Xingshuai, pp. 190-212; Public Record Office, War Office Records (WO), 208/268, Office of Military Attaché of the British Embassy in China to the British War Office, November 12 1942; FO 436/16518 F5103/254/10, Report from Teichman in Lanzhou to Sir Horace Seymour (British Ambassador to China), September 3 1943, enclosed in Seymour to Foreign Office, September 14 1943.

³ CB, 09-1406, Chiang Kai-shek's instruction to Ma Buqing, July 19 1942.

⁴ WO 208/428, “Moslem soldiers in Tsaidam Basin: Guarding Flank of China's Northwest Road”, extract from *China Newsweek* 8 (October 24 1942).

⁵ FO 436/16605 F6275/254/10, Report from Teichman in Tihwa (Urumqi), dated September 24 1943, enclosed in the British Embassy in China to Foreign Office, November 14 1943.

⁶ WO 208/268, “China News”, issued by the London Office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dated September 22 1942.

⁷ 参见: Chiang Kai-shek's speech to the non-Han elites in Xining, in Qin Xiaoyi ed., *Zongtong Jiangong Sixiang Yanlun Zongji*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General collections of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s thoughts and speeches) (Taipei: Kuomintang Historical Committee, 1984), 19, pp. 216-218; *Zhongyang Dangwu Gongbao* (Gazette of the KMT central party affairs) (Chongqing) 4, 19 (September 1942), pp. 23-24; *Zhongyang Zhoubao* (The KMT central weekly) (Chongqing) 5, 19 (December 1942).

⁸ Chiang Kai-shek, “Ningxia Junshi Huibao Xunci” [A speech of admonition for the military briefing in Ningxia], dated September 2 1942, in Qin ed., *Zongtong Jiangong Sixiang Yanlun Zongji*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Vol. 19, pp. 219-228; FO 436/16373 F7411/1689/10, Seymour to Foreign Office, October 5 1942.

⁹ Qi Tao, “Gaishu Guomindang Zhengfu dui yuan Alashan qi di Tongzhi” (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KMT's rule over Alashan Banner), in *Alashan Meng Wenshi* 《阿拉善盟文史》(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Alashan League), 2 (1986), pp. 49-80.

令宁夏的穆斯林阿訇（宗教导师）把国民党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纳入日常布道中。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和统治邻近地区的共产党的影响。¹

作为战时中国应许之地的西北

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使中国、美国、苏联和英国组成反抗轴心国的同盟国。重庆在理论上不再是单枪匹马地战斗了。1942年初，自称战无不胜的苏联红军在东欧遭到德国的沉重打击，莫斯科顿时无暇顾及遥远的中亚事务。在另一边，由于估计希特勒将最终战胜苏维埃俄国，麻烦缠身的斯大林不可能再提供任何支持，独立的新疆统治者盛世才决定从先前的亲莫斯科政策转变为反共立场。奸诈的盛世才很快发现，修补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最符合其利益，因为蒋介石现在受到美国在外交、财政和军事上的支持。²

因为中国西北地区政治局势的变化，蒋介石政权又获得一个在新疆建立起权威的绝佳机会。重庆和乌鲁木齐展开了秘密协商，直至1942年夏盛世才和蒋介石达成了一个秘密协定。很快，盛世才发表了与蒋介石结盟的正式宣告。作为盛世才愿意与国民党合作的回报，蒋介石承诺将不追究盛世才“过去在新疆的错误行为”，并保证盛世才在乌鲁木齐的地位不被侵犯。³

到1942年底，在盛世才的坚持下，苏联军队和技术人员开始撤离新疆，代之而来的是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和财政势力。已经驻扎在河西走廊的国民党部队跨越了甘肃和新疆的边界，最终到达哈密，替代了苏联著名的“第八军团”。这场胜利象征着重庆控制新疆的初步胜利。⁴在蒋介石的日记里可以发现其对国民党收复新疆的喜悦。在1942年12月21日，蒋介石写道：

从甘肃兰州到新疆伊犁的土地，跨越了三千公里，面积两倍于满洲，现在已被中央收复。随着中央控制了新疆，我们的后方被巩固了。⁵

到1943年底，当盛世才意识到莫斯科战败不仅不是迫在眉睫、甚至根本不可能发生时，他试图再次改变亲国民党立场。但是这一次盛世才没有成功。在1944年秋，重庆宣布不再被斯大林信任的盛世才被免职，替代他的是一名蒋介石的心腹。⁶这次变动不仅结束了盛世才在新疆的独裁统治，也标志着自1911年以来中央政府第一次恢复控制了中国最西北的地区。

随着其权力在西北地区的增长，国民党政权认为有必要于1942年至1943年在新疆展开早已完成的国家政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以达到巩固其地位的目的。⁷重庆高层也相信，必须鼓励西南地区有能力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献身于这片“新获得的”西北边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国民党官员在四川和西北边疆频繁往来，他们致力于巩固国民党政权在当地的行政控制。⁸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国民党公务员参加战时的“向西部进军”运动，财政高度紧张的国民党政权颁布

¹ Wu Zhongli ed., *Ningxia Jindai Lishi Jinian* 《宁夏近代历史纪年》(The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modern Ningxia) (Yinchuan: Ningxia renmin chubanshe, 1987), pp. 286-291; Hu Pingsheng, *Minguo Shiqi di Ningxiasheng* 《民国时期的宁夏省》(Ningxia Provinc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Taipei: Xuesheng Shuju, 1988), pp. 153-185.

² Whiting and Sheng, *Sinkiang: Pawn or Pivot?* pp. 51-53; Harriet Moore, “Soviet Far Eastern Relations since 1941,” *Pacific Affairs* 17, 3 (September 1944), pp. 294-310.

³ CB, 09-1413, Chiang Kai-shek’s secret instructions concerning Chongqing’s negotiation with Sheng Shicai, July 1942.

⁴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pp. 157-162; Svat Soucek, *A History of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71-272.

⁵ 参见 Keiji Furu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1981), pp. 744-745.

⁶ Chen Huisheng and Chen Chao, *Minguo Xinjiang Shi* 《民国新疆史》(A history of Republican Xinjiang) (Urumqi: Xinjiang renmin chubanshe, 1999), pp. 376-382.

⁷ ASNDC, 003/2352,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to the Executive Yuan concerning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December 31 1942.

⁸ Ze Ren, “Lun Bianjiang Gongzuo zhi Zhanwang” (On the prospect of frontier dealings), *Bianzheng Gonglun* 《边政公论》(Frontier Affairs) (Chongqing) 3, 12 (December 1944), pp. 1-3; Jin Shaoxiang, “Guomintang Fandong Shili Jinru he Tongzhi Xinjiang” (The entry of KMT anti-revolutionary influence into Xinjiang and its governance in this province), in *Xinjiang Wenshi Ziliao Xuanji* (Selections of Xinjiang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2 (1979), pp. 18-73.

了一系列条例，给予志愿前往新疆服务的公务员优厚的待遇。¹

令人感兴趣的是战争期间国民党高层是如何把辽阔而人烟稀少的新疆描述为陷入战争困境的中国人民的“应许之地”。由于西南地区面临人口过多的问题，国民党政策制定者认为有必要启动把四川汉族人口前往边疆的老想法。官方宣传和政府支持的出版物都努力把新疆描绘为可以为移民提供土地、自然资源和希望的处女地。² 国民党还试图把“向西部进军”运动与爱国主义相联系，其宣称到西部开垦新疆就是帮助政府抵抗日本。重庆的领导人特别催促四川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把他们的知识和专业技能贡献给西北边疆。³

战时国民党政权的向中国西部边疆展开了充满机会主义的进军，作为其结果，国民党的第二次“开发大西北”计划在1942年至1944年期间达到巅峰，但在同时，国内外也出现对该计划的批评。例如，在战时中国的英国外交官认为，中国对西北进行工业化和开发自然资源的企图，以及他们对西北开发项目的大力宣传，只不过是抵抗日本侵略以及未来与中国共产党甚至苏联斗争，所以向美国索取财政和技术支持的另一个工具。因此对于英国政府而言，中国西北最终只是“中国人试图向美国人兜售的又一块金砖”。伦敦和重庆的英国官员都相信，由于重庆缺乏技术和财政资源，西北在战时和战后很难被很好地开发。⁴

尽管有这些负面的评论，应当公正地认为，国民党至少还是获得了部分成功。在1943年早期，重庆在新疆东部推动了一项大规模的土地开发计划。超过两万名汉族人，大部分是河南、陕西和陕西的难民、复员军人和失业者，前往哈密和吐鲁番进行开垦工作。⁵ 一系列的经济和移民工程被实施，不仅旨在解决西南地区过多的人口，也是为了加强国民党对边疆的行政控制。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在新疆东部、河西走廊、宁夏和青海为中国本部的汉族移民建立的若干军事移民区。这些移民负责公路建设、灌溉、林业、和土地开垦等任务。为了监督这些移民和工程，重庆派遣官员前往督察，因此加强了国民党对该地区的影响。⁶

国民党政权也鼓励西南地区的党员、公务员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前往边疆服务。根据一份统计报告，到1943年中期，至少有7200名国民党新干部前往新疆，服务于国民党最近设立的组织机构。为了促进更多的人前往边境省份服务，国民党中央颁布了新的法令和条例以示支持。在重庆，政府为即将前往新疆工作生活的公务员开设了培训课程。⁷ 另外，国民党高级官员也频繁地来往于四川和边疆省份去执行检查任务，这肯定会提高国民党政权的威信。1943年到1943年间，重庆前往西北的高级官员如此之多，以至于驻守兰州并负责这些显贵们安全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

¹ ASNDC, 003/1763, “Guidelines for the youth and personnel affairs on the frontiers”, enclosed in the Military Affairs Commission to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September 3 1941; 004/114, “Regulations concerning provisions of the staff working on the frontiers”, enclosed in the Military Affairs Commission to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April 25 1944.

² 参见: “Guidelines for the KMT frontier affairs”, *Zhongyang Dangwu Gongbao* 4, 19 (September 1942), pp.23-24; Zhao Minqiu, *Yuejin zhong di Xibei* (The leaping Northwest) (Chongqing: The New Chinese Culture, 1940).

³ Chiang Kai-shek, “Kaifa Xibei di Fangzhen” (Guiding principl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west), in Qin ed., *Zongtong Jianggong Sixiang Yanlun Zongji* 19, pp. 169-181; Zhu Jiahua (Head of the KMT Organizational Department), “Frontier issues and frontier works”, *Zhongyang Zhoubao* 5, 19 (December 17, 1942), pp. 26-32.

⁴ WO 208/408, “China: Political and General Conditions in Kansu [Gansu] and Chinghai [Qinghai] Provinces”, M.I.6. Political Report, dated June 28 1943.

⁵ ASNDC, 003/2352,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to the Executive Yuan concerning the removal of refugees from Henan, Shanxi and Shaanxi Provinces, December 31 1942; 003/2361, Executive Yuan to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February 22 1943.

⁶ ASNDC, 003/2359,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to the Executive Yuan, December 30 1942;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Yuan concerning the execution of immigration and colonization projects in the border provinces, May 7 1943; T.V. Soong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Box 25, “Bluepri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rthwest for the fiscal year 1943”, proposed by the Central Planning Bureau, November 1 1942.

⁷ Academia Historica, Archive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0128.12/3611.01-02, “Statutes concerning public servants in the frontier”, May 18 1943. 在对即将前往新疆工作的官员的演讲中，蒋介石特地强调他们应当避免与盛世才的下属发生冲突，应当充分尊重当地的少数民族群。参见: Chiang, “Dui Paifu Xinjiang Gongzuo Tongzhi zhi Zhishi” (Instructions to the party cadres dispatched to Xinjiang), in Qin ed., *Zongtong Jianggong Sixiang Yanlun Zongji* 19, p. 403.

绍良不得不向蒋介石抱怨这项意外任务过重。¹

后记

到中日战争后期的 1945 年夏,大部分中国的西北地区都已经在国民党比较有效的控制之下。只有新疆北部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例外。²甘肃和新疆都被蒋介石信任的心腹所控制。虽然青海和宁夏仍然被马氏穆斯林家族统治,但国民党下辖的组织已遍及两省。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财政和经济力量不断增加,以致其有能力在新疆北部和南部任何地区建立海关。国民党试图直接控制新疆的税收和贸易,这个政策在战前还是完全不现实的。国民党的战后政策制定者计划在乌鲁木齐建立海关,并在阿勒泰、塔城、伊宁、吐鲁番和喀什建立分支机构。这样,国民党政权就可以逐渐控制新疆与苏联、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英属印度之间的贸易和税收。³

从事后来看,与日本的战争向国民党提供了向遥远的、穆斯林统治的中国中亚边疆扩展权威的意料之外的机会,而战前国民权威在那里根本不存在。到 1944 年底,在帕米尔边境的绿洲城市塔什库尔干的所有市政官员,包括警察局长、海关和邮局的负责人都是直接由重庆任命。⁴到 1945 年夏,至少有三支国民党部队驻扎在靠近克什米尔的遥远边界。二战结束后,国民党在当地的势力大为增强,以至于筋疲力尽的英属印度当局开始抱怨由国民党支配的新疆省政府已经垄断了新疆与印度的贸易。⁵

国民党向西北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完全可以认为,国民党在战争期间逐渐建立的政治、军事和财政影响以及基础设施,讽刺性地为共产党控制西北铺平了道路。特别是在新疆,国民党军事力量在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在 1949 年的关键时刻,指挥着国民党驻新疆的超过 8 万名精锐部队的指挥官陶峙岳最终决定向中国共产党投诚。⁶如果没有新疆汉族政权的政治帮助,共产党接管新疆将会面临更多的困难,而且完全有可能产生更多的暴力冲突。新的北京政府是否有效地巩固了其在西北的权力仍然饱受争议。

从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开始,由于东部面临日本军事侵略,中国本部的民众对发展西北非常热情。国民党政权也认为非常有必要把辽阔的西北转变为新的权力基地。与日本的全面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选择了西南的四川作为战时基地。但是,西北地区仍然对国民党具有优先重要性。通过国民党在中国长达 20 年的统治,“发展西北”的观念已经成为其政治战略、政党议程和官方项目的一部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如本文所展示的,国民党达到其目的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机会主义的,混合了恰当的时机、政治妥协和军事伎俩。

¹ ASNDC, 003/2439, KMT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to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March 19 1943.

² 1994 年秋新疆北部发生了反抗国民党政权的动乱,1954 年春夏期间得到苏联强力支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其控制了天山以北的区域。1945 年夏蒋介石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政治交易促成了一个艰难的妥协,国民党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形成联合政府,由负责新疆省政府的国民党将军张治中领导。参见: David Wang, *Clouds Over Tianshan: Essays on Social Disturbance in Xinjiang in the 1940s* (Copenhagen: NIAS, 1999), and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New York: M.E. Sharpe, 1990).

³ 参见: 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 (OIOC), British Library (London), L/P&S/2406, British Consulate at Urumqi to the British Embassy (Chongqing), January 13 1944; Mr. Ting Guitang (Deputy Inspector-General of Chinese Customs at Urumqi) to the British Consulate at Urumqi, February 12 1944.

⁴ OIOC, L/P&S/12/2407, Travel reports by K. P. S. Menon (Indian Agent-General to China)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October 25, December 19 and 29 1944.

⁵ OIOC, L/P&S/12/2407, Report of Mr. Etherington-Smith (British Consul-General at Kashgar), enclosed in the British Embassy in China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ugust 23, 1945; L/P&S/12/2405, British Consulate in Urumqi to the British Embassy in China, September 2 1945.

⁶ Wang Fen, “Zouxiang Guangmin—Huiyi Zhao Xiguang Shuaibu Qiyi Qianhou” (Heading for the brightness—A remembrance of Zhao Xiguang’s leading troops to revolt), in *Xinjiang Wenshi Ziliao Xuanji* 《新疆文史资料选集》, Vol. 3 (1998), pp. 109-115; Fang Yingkai, “Mianhuai Zhao Xiguang Jiangjun” (In memory of General Zhao Xiguang), in *Kashi Wenshi Ziliao* 《喀什文史资料》 (Kashgar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Vol. 5 (1990), pp. 61-74.

【论 文】

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演化及其当代启示

黄达远¹

一、清帝国时期的族群分治：乌鲁木齐空间形态上的“双子城”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平定西域大小和卓木叛乱至同治回民起义前的一百多年间，清朝在新疆推行伊犁将军为首的军府制度治理新疆。伊犁将军驻扎伊犁惠远城，名义上统辖全疆。在乌鲁木齐，设乌鲁木齐都统一职，驻扎满城巩宁。另一方面，还设立了镇迪道，隶属甘肃巡抚，驻扎汉城迪化。从行政建制上看，建立了军府与郡县制并立的制度。据史料记载，迪化城是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所建军城的基础上、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又经过扩建，钦定城名“迪化”。在此基础上，乾隆三十年（1766年）十二月由于绿营官兵和商民陆续前来，城内官署、民房已经不敷居住，再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改扩建。两年后完工，修成的迪化新城“周四里五分，高二丈二尺五寸，底宽一丈，顶宽八尺，城壕周四里八分，宽深各一丈。”²城门名为：东惠孚、西丰庆、南肇丰、北憬惠。城内万寿宫、庙宇、衙署、仓厂、兵房合计二千六百七十一间。乾隆三十六年（1772年），又修建了巩宁城，“周围九里三分，墙连垛口高二丈二尺五寸，厚一丈七尺。城外荷池周围一千九百八十九丈六尺，宽二丈，深一丈”。³新修的满城气势宏伟，钦定城市名称为“巩宁”，有四门：东承曦、西宜穡、南轨同、北枢正。以满、蒙、汉、维4种文字书写门端。城中有鼓楼，还有关帝庙、城隍庙、文昌宫、昭忠祠、玉皇阁、财神庙等多处庙宇。城内有“万寿宫、关帝庙、衙署、仓库、公馆、官房、兵房、堆房一切通共大小房间九千九百五十间。”⁴规模比迪化大。

迪化为汉城、巩宁为满城，两城相距约十里地，形成了地域并列的“双子城”。这种地域空间并列的城市双城结构，功能也完全不同，满城是军城，汉城是商城。道光十三年（1833年）伊犁将军萨迎阿路过乌鲁木齐吟咏，“满城清肃汉城哗，都统尊崇远建牙。文武风流成省会，商民云集丽京华。”⁵历史名人纪晓岚、林则徐、祁隽士等都留下过迪化与巩宁城的不少记载。纪晓岚在迪化流放两年，赞叹乌鲁木齐的繁华：“商民留寓，往往不归。询之则曰此地‘红花’，红花者，土语繁华也。”⁶还记载说，“乌鲁木齐，初西番一小部耳。神武耆定以来，修养生聚，仅十余年，而民物之蕃衍丰富至于如此，此实一统之极盛。”⁷

这种双子城是清帝国边疆治理政策的产物，正如王柯指出，清帝国拥有中华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的双重性质，要保持自身的少数民族政权的特质，所以在新疆建立了满城和汉城。⁸需要指

¹ 本文作者为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后。

² (清)佚名，《乌鲁木齐政略》《城堡》。

³ (清)永保修、达林、龙铎编纂，《乌鲁木齐事宜》《城池》。

⁴ (清)佚名，《乌鲁木齐政略》《城堡》。

⁵ 星汉，《清代西域诗选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

⁶ (清)纪昀，《乌鲁木齐杂诗》·《游览》。

⁷ (清)纪昀，《乌鲁木齐杂诗》·《自序》。

⁸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200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的是，“双子城”在天山南北均有分布，不同的是在天山南路主要是汉城与回城并立，天山北路主要是满城和汉城并立。¹

二、近代民族国家构建时期：多重权力构造下的“一城四区”

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王朝在一系列内忧外患下，逐渐放弃民族政权的色彩，开始向纯粹的中华王朝和民族国家过渡。1864年的新疆爆发反清“圣战”，本来是“内忧”，但是随着阿古柏侵占新疆大部地区，俄国占领伊犁，以及俄英两国私自承认了一个建立在清朝领土上的非法政权，它们相继与阿古柏政权签订条约的做法，严重地侵害了清朝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新疆问题不再简单是一个内政问题，而是演化为一个国际问题。²这时的清朝政府也逐步放弃了“天朝”的观念，认识到自己需要加强主权和领土意识，这恰恰是民族国家的核心内容，收复新疆后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从其特点看，首先就是明晰了行政区划，其次就是实现了“齐户编民”，即将天山南路的“阿拉巴图”（农奴）改为国家治理的民户，给予“国民待遇”，第三，由间接统治变为了直接统治，国家统治权力的强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这一思维实际上的体现了清王朝褪下“帝国”色彩转向民族国家的努力。

新疆行省的省治选择迪化，乾嘉时代修筑的迪化城、巩宁城均毁于战火，巩宁城“城身大半倾圮，城内一片瓦砾，从前死尸骸骨，随处理瘞，垒垒无隙地，满目荒凉，于兹为甚”。³，但是满城巩宁已经无法恢复，加上经过战乱后的满族人口锐减，不足以建设“专城”——满城，加之“经费维艰”，清廷只好废弃修建满城、汉城的想法，而是“满汉联为唇齿”，将迪化、巩宁连为一体，“迪、巩二城联络一气，唇齿相依。”⁴新建的迪化城“周十一里五分二厘，门七，南面及东西各二门。二十年来抚恤疮痍，生聚教训，亦塞外之雄郡也。”“军城”变成“治城”，原来的“双子城”变成单一城市，城市空间整合成一体。新建的迪化城很快恢复了元气，特别是城内的天津杨柳青商人十分活跃，由天津杨柳青货郎随西征军“赶大营”起家的“京津八大家”分别是永裕德、同盛合、公聚成、复泉涌、升聚永、聚永兴、德恒泰、中立祥。⁵他们形成很大的商业势力，“津人植基最先，故根本深固，分枝遍及南北疆”，迪化城的大十字街一带，均为著名的天津商号，繁华一时，有“小杨柳青”之称。除了天津商人，山西商人在清代新疆专营“晋茶”。晋商实力也比较雄厚，“晋商富贾也，工会计，利析毫芒，资本率至十数万，官中协饷不继，犹时资以悒注。”⁶

新疆行省建立之初，虽然晚清的迪化城不分汉城、满城，从地域空间上二城合一，但是内部空间上却形成了不同的居住区。20世纪初，俄国驻塔城领事就报告说：“乌鲁木齐按居民的民族成分分成好几个居住区，这种情况在中国西部地区是常见的。城里有汉人区、满人区、萨尔特人区（指维吾尔人）以及住有俄国居民的俄国侨民区。除俄国侨民区外，每个地区的四周部筑有相当坚固的草泥围墙，四面都有门，看起来的确象一座座单独的城堡。除此之外，在这些城堡里面还筑有一些小堡垒——营盘。营盘周围也有墙但比城培矮些。营盘里驻有各种机关和军队。此外，城附近还筑有一些单独酌工事，里面设有营房，驻扎军队。所有的政府机构都设在工事里，因为

¹ 参见黄达远，“清代新疆政区变革与城市发展”，《西域研究》2009年第3期。

² 王柯，“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新疆建省问题”，《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70期。

³ （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六年四月条。

⁴ 乌鲁木齐都统恭镛奏，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03—6184—049。

⁵ 咎玉林，《“赶大营”与“八大家”》，《乌鲁木齐史话》，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1页。

⁶ （清）王树楠：《新疆图志》卷二九《商》。

当局对他所管辖酌居民不大信任。”¹

这个报告反映了俄国势力对城市空间构造的影响，1895年，俄国政府利用“还辽有功”，向清总理衙门提出开放乌鲁木齐通商，设立领事的要求。同年12月，清政府准俄国在乌鲁木齐设立领事并建贸易圈，双方商定在省城南门外进行勘地并进行化界。1896年11月，中俄签署《划定乌鲁木齐领事及贸易地址条约》，全文共5款，主要内容是规定乌鲁木齐俄领事馆及俄商贸易圈界址范围，贸易圈占地面积约240亩。1897年8月，新任驻迪化总领事吴司本抵任，在划拨界址西北角俄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馆（今胜利路、延安路交界处），随后组织俄商在贸易圈内建盖房屋铺面。1898年乌鲁木齐贸易圈初建时，仅数家俄商店铺，俄商民200余人。至1907年俄商店铺已达30多家，俄商民增加至800余人。1905年夏，乌鲁木齐俄领事要求扩展贸易田地。巡抚潘效苏擅许拨划60多亩地段。至宣统末年，乌鲁木齐贸易圈又向南北延伸多处。²在俄国的强烈要求下，在喀什噶尔、伊宁和塔城等驻有俄国领事的城市都建有贸易圈。还有美国、德国按照“利益均沾”的原则乌鲁木齐贸易圈开设了洋行。乌鲁木齐贸易圈内洋行林立，主要以俄国洋行为主，著名的俄国洋行如下：

乌鲁木齐贸易圈的俄国“洋行”简表

名称	开设时间	创办人	资本额（卢布）
芝盛洋行	1850	俄商孜牙合吉（塔塔尔族）	七十万
仁忠信洋行	1852	俄商台吉鄂斯满（乌孜别克）	五十万
天兴洋行	1860	俄商伊斯哈克（塔塔尔族）	七十万
吉祥涌洋行	1861	俄商热木扎阿吉（塔塔尔族）	三百万
吉利洋行	1880	俄商满速尔江（乌孜别克族）	七十万
茂盛洋行	1862	俄商沙木斯克江等（乌孜别克族）	三十万
德和洋行	1881	俄商热以木江（乌孜别克族）	一百万
德盛洋行	1883	俄商伊敏江（乌孜别克族）	一百五十万
大力洋行	1911	俄商巴里迪肯（俄罗斯族）	八十万

资料来源：咎玉林：《外商洋行与迪化“贸易圈”，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12辑。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洋行经理主要是俄属的中亚商人。他们雇工也主要是中亚和新疆穆斯林，洋商是依靠俄国领事馆发展起来，贸易圈成为乌鲁木齐的一个另类的社会空间。

俄国驻塔城领事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说，“俄国侨民还享有一种特权这就是在设有领事馆的地方，有权建立不与中国人混居的单独的居民点，这样的居民点，在中国西部地区称为贸易圈。在贸易圈范围内，中国政府当局完全不能行使权力。这样贸易圈就仿佛是俄国本土的一角。在那儿居住的是俄国臣民，行使的只是俄国的法律，遵循的是俄国的规矩。占有单独划开的地区来建立俄国侨民区的权利是早在伊犁条约中就规定的”。³可以说，贸易圈与晚清时期列强的租借地相似，具有治外法权，领事馆是贸易圈的“政府”，“贸易圈就仿佛是俄国本土的一角”，俄国领事“非常坦率”的承认贸易圈是“国中之国”。俄国侨民区位于今天的乌鲁木齐市延安路一带，俄国侨民区的存在，使乌鲁木齐城市地域空间向南延伸，它的存在也说明这一时期乌鲁木齐是一个具有浓厚殖民色彩的城市。

此外，乌鲁木齐作为民国时期新疆最大的商业城市和民族贸易中转市场，来自沿海、内地的

¹（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著，新疆大学外语系译，《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4页。

² 厉声，《中国新疆与俄（苏）贸易史（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第134-135页。

³（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著，新疆大学外语系译，《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50-251页。

汉族商人和维吾尔商人、回族商人等不间断的进行民族贸易，贸易地点就主要在迪化的南门关厢外，日久就形成了少数民族为主的聚居区，就是今天南门外俗称山西巷子和二道桥的街区，也是文献中所称的“萨尔特人区”。

可以看到，晚清民国初年的乌鲁木齐城市空间受到这一时期新疆建省以后的行政建设、民族贸易和外来（主要是俄国）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不同社会空间的异质性很强，并通过有形的城墙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了城市空间上的“合而不融”的结构，也就是“一城四区”。

三、突破城墙：乌鲁木齐城市形态与城市空间的重建

沙俄帝国覆亡后，1920年代初，新疆省政府正式收回贸易圈内的治外特权，将其纳入省城的市政管理当中，地名称为“洋行街”，正式成为乌鲁木齐城市地理空间的一部分。“乘坐乌鲁木齐市一路公共汽车，从北向南行驶，从解放南路二道桥站经胜利路到三屯碑，俗称‘南梁大街’，解放前称作‘洋行’。因为外国‘洋人’在乌鲁木齐所开设的商行，大都聚集在这条街上，所以在旧社会的路标上，写着‘洋行街’三个字。”¹“萨尔特人”区与俄国侨民区界限逐渐模糊，融为一体。

城内满族营区逐步也和汉人区融合为一体，城市内部的营盘界限被打破，变为居住区。不过，迪化城的城墙却依然没有拆除，乌鲁木齐以南门城墙为界，从“一城四区”演变为成了“一城两区”。已故乌鲁木齐史志办咎玉林老人在上个世纪年代初期的回忆录中写道：

肇阜门是解放前乌鲁木齐南城门的官称，按照字义解释，‘肇阜’就是‘开创幸福’的意思，可是在漫长的旧社会里，肇阜门却是天堂和地狱的分界线。一道阴邃的城门，一堵森严的城墙把乌鲁木齐分隔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城里，“朱门酒肉臭”，城外，“路有冻死骨”。特别是由于历代反动政府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少数民族大都居住在肇阜门外的城关地区，就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商户，也不能跨进肇阜门的关口。

姑且不论作者回忆录写作时的话语背景，我们从文字中感受到两种话语的阐释，一是在阶级话语中是“南门”是阶级的分界线，二是“民族”的分界线，民族隔离、阶级隔离依然存在。

抗战时期，应新疆统治者盛世才的邀请，一些中共党员来到新疆工作。1941年，毛泽民同志任迪化市政委员会副委员长时，由工程师魏亚藩、技师王绍曾编绘了《迪化市分区计划图》，即总体规划。²按照中共党人的城市规划，也按照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对城市进行了改造，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按照民族平等的原则，拆除了南关城墙。

抗日战争时期，来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帮助地方当局拆除了肇阜门。摧毁了财神楼，填平了民族隔离的鸿沟——护城壕，一条新修的碎石路从市区中心一直通到三屯碑。一九三七年夏天，新建的“新光电灯公司”从这里开始发电。一九三九年春天，新修的新疆学院大楼在这里壮严出现，特别是共产党人工作和居住的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和八户梁招待所在这里出现以后，人民才开始见到了曙光。³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共党人主持的城市建设不仅突破了城墙作为城市社会空间隔离的形态，使乌鲁木齐城市空间上整体上连成一气，也形成了新的社会空间。另一位老人回忆说：

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当局为顺应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要求，把这座徒有其名的“肇阜门”夷为平地，开辟成文化广场，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群，聚集在这里观看街头剧、观看抗战漫画和

¹ 咎玉林：《洋行内幕》，收入《乌鲁木齐史话》，198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第68页。

² 刘建焜：《对乌鲁木齐城市规划的回顾》，《乌鲁木齐地方志》，1995年第1期。

³ 咎玉林：《肇阜门和三屯碑》，《乌鲁木齐史话》，198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第37页。

聆听抗战演讲。南门地区自从出现了文化广场，确实使乌鲁木齐的各族人民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强烈地爱国主义思想不禁油然而生。南门地区真正的繁荣景象，则是从推倒了“肇阜门”以后才开始的。¹

同时，中国共产党人的进驻（八路军办事处在延安路）、新疆学院的招收汉族学生，也使不少汉族人口进入南门以南的社区居住，使这里高度聚居的民族居住格局转向混居，这是历史性的突破。新中国成立前，据新疆警备处统计（1949年），乌鲁木齐市城乡汉族人口为汉族人口达到67588人，占全市总人口62.75%；回族人口19395人，居于第二位，维吾尔族人口有17841人，第三位。²乌鲁木齐形成了多元化的人口格局。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1950年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南门至三屯碑片区归其管辖。1956年，乌鲁木齐城市格局又有新的变化。国家计委选厂工作组来乌鲁木齐后对促进新市区规划的实施起了推动作用。当时农机厂，519队、铁路局等用地大户都相继提出基建用地问题，迫切需要城建部门作出正确抉择。自治区党政领导王恩茂，赛福鼎同志决定市区向西北方向发展，并以开辟新市区为主，在充分利用、逐步改造的方针下建设老城区。³因此，在天山区开展了上个世纪50年代的城市住宅改造运动(公有化)。据1943年《新疆日报》刊登的国民党时期调查数据显示，在今天山区辖区内共有一等住房2208间，二等住房9072间，三等住房1.82万间。1949年底统计，私房数占总房屋数的72%。1959年，乌鲁木齐市进行私房改造，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针和赎买办法，将私人房产纳入“国家经租”或公私合营，由国家直接经营管理。改造以后，私人占有房屋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截止1985年底统计，私人房屋占各类建筑总面积的4.2%。⁴经过私房改造，进一步打破了居住格局的封闭性。同时，一些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迁入了南门以南的社区，主要有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教育厅、新疆新华书店、新疆农业厅、新疆文化厅、新疆妇幼保健院、新疆艺术学院、新疆电视台、乌鲁木齐友谊医院等。还有一些中小学、国营企业新建起来，如新疆实验中学、乌鲁木齐市六中、乌鲁木齐第十小学等。此外，还建立了乌鲁木齐无线电厂、乌鲁木齐天山食品厂一些国营企业。在单位制“政社合一”体制下，职工的住房均由公家解决，迁入的各族职工及其家属使这里的民族人口杂居的状况最终得以形成。民族高度聚居的格局得到了很大改变。

总之，上个世纪50年代初至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这一时期乌鲁木齐城市空间格局的变迁以政府行政力量为主要推手，乌鲁木齐城市空间主要向西北方向扩展，南部的地域空间变化不大。城市南部主要是通过行政、企事业单位迁入，人口增加，加上单位分房制度，形成了这一时期民族逐步混居、杂居的情况。单位体制下，也还有相对隔离的状况，王建基总结了1990年代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汉、回三个民族的居住格局特征：（1）因历史文化原因形成的聚族而居特点在乌鲁木齐市中心、老城区仍然突出，呈现出维吾尔、回族居住相对集中于某一街巷的特色；（2）政治、经济因素逐渐使单一民族聚居向多民族杂居转变。新设市区各民族居住格局呈网状分布，“单位集体户”民族杂居为其显著特点；（3）按“分离指数”变量指标测度，维吾尔、汉、回三个民族居住仍处于相对“隔离”状态。不过，经过近50年政府的融合‘媒介’作用，过去基本隔离聚居的居住格局有了很大改变。

¹ 尔昌，“解放前的南门市场”，《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第73页，1982年。

² 参见乌鲁木齐志编纂办公室编，《乌鲁木齐市志》，1994年。

³ 刘建猷，“对乌鲁木齐城市规划的回顾”，《新疆地方志》1995年第1期。

⁴ 王建基，“乌鲁木齐市民族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四、市场经济导向下的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变迁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期至 21 世纪初，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松动，来自区内外的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单位制解体和弱化，市场经济成为不可遏制的洪流，商品房制度逐步推广，市场经济的力量成为城市空间建构的主要推力。市场经济对城市社会空间的影响大体形成两种方式。

其一是随着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边疆宾馆边贸发展而形成的流动人口散居型的模式。随着天山区二道桥“国际大巴扎”旅游贸易和边疆宾馆边贸的崛起，加上乌鲁木齐市优质的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天山区，天山区一度是乌鲁木齐房价“最火”的地方，土地价格一路走高，房价不断攀升。2004 年，大湾乡撤村建居，成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一个街道，建立了红雁街道办事处，原来的农用地主要用来建筑商业小区。从笔者的调查来看，天山区围绕着二道桥国际大巴扎和边疆宾馆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仅从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团结路上的边疆宾馆来说，作为国家二级口岸，它承担着中国对中亚贸易的中转销售市场的功能，其产业链内部主要有仓储、销售、运输、金融、餐饮、旅店、翻译、通讯、俄语语言培训等行业。这一产业链外围还包括服装、电器、日用百货、干果、民族手工艺品、装修建材等生产厂家，据估计，乌鲁木齐市直接或间接围绕这个产业链的服务从业人口规模不低于 3 万人。在边疆宾馆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商圈，吸引了大量来此从业的外来流动人口，其中还有一些是来自中亚的客商。这一商业产业链的形成是市场自发的，上下游之间的联系不是哪一个民族可以垄断的，因此，形成了多民族共同参与的特征，其中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克尔克孜族（吉尔吉斯）、俄罗斯族等，交流语言主要是汉语、俄语、维语等。据笔者调查，从事边贸生意的流动从业人员，其中大部分人员的收入比较丰厚，而且这些从业人员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这对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交往具有重要的作用，他们居住地选择也主要考虑的不是民族成分，而是生活环境便利，尽管流动人口多，但是他们大多不聚居，而是散居在城市各处。

其二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赛马场社区形成的流动人口聚居型模式。天山区有少数几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的社区，笔者调查的社区是一处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社区：“赛马场”。它位于乌鲁木齐市市区南郊中环路，是乌鲁木齐市最大的二手机动车交易市场所在地，隶属乌鲁木齐市延安路街道办事处管辖。“赛马场”社区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此前，它还属于比较荒凉的郊区。1996 年，由于乌鲁木齐市修建河滩快速路，将乌鲁木齐市最大屠宰场市场进行了整体搬迁，从珠江路搬迁到中环路。乌鲁木齐牧工商总公司投资 1000 多万元修建了中环路牛羊屠宰市场。当年 6 月，中环路牛羊屠宰市场正式开业。该市场占地十几亩，日屠宰能力最大可以宰杀羊 1.2 万只、牛 1000 头，是乌鲁木齐乃至西北地区最大的牛羊屠宰市场。随着市场的兴起，带动了附近的肉类批发市场、皮毛市场、活畜交易市场，加上周围的旧车交易市场和干果市场，被市民通称为“六大市场”。这里因为是批发市场，又是城市郊区，房租便宜。外来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出于生计成本较低的原因，纷纷到此居住，这一社区开始发展起来，这里属于城郊结合部，管理松懈，于是流动人员盖起来成批的自建楼房，自发形成了一个社区。

2004 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决定将屠宰场再次搬迁到乌鲁木齐西山。但是，由于这里已经形成了牛羊肉交易的“传统”，依然私下保留了活畜交易市场。同时，另外一个比牛羊肉交易市场更大的新兴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发展起来，再次拉动了赛马场社区的人口聚集效应。2009 年 4 月 13 日，据亚心网一则报道称《二手车占道，乌鲁木齐赛马场道路瘫痪》：乌鲁木齐旧机动车交易市场（赛马场）有关人员介绍，每年三四月份是二手车交易的高峰期，市场有 4 万多平方米的场地

(含轿车和货车交易区), 轿车交易区可以容纳三四千辆车, 一般在早上 8 点前就停满了, 致使一些车停在外面影响了交通, 这位工作人员还说, 很多时候市场保安和经理都会到市场外疏导交通。

据笔者 2010 年初的调查, 仅赛马场东社区共有 3599 人, 其中常住人口仅有 813 人, 占总人口的两成。流动人口的量较大, 部分流动人口几乎一个月搬一次家, 这些流动人口百分之七十是维吾尔族。这些流动人口的流出地主要是南疆的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区以及少部分来自吐鲁番、伊犁、克拉玛依、塔城、阿图什等地区的人, 其中, 流出人口最多的是和田, 其次是喀什。对流动人口的调查表明, 他们收入低, 受教育程度低、但是对融入城市的希望高, 但是流动人口属于弱势群体, 其身份得不到认可, 户籍无法解决, 直接影响了子女入学、就业、治病等, 生活圈子沉闷与精神上的压抑, 形成了一个民族成分相对单一、高度聚居的社区。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社区的形成对乌鲁木齐城市格局来讲, 又带来了一种城市社会空间相对隔离的格局。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自发形成了例如赛马场、黑甲山、大湾等少数几个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自发形成的社区, 从人口总量上来看并不大。据乌鲁木齐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2009 年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报表》显示, 截至 9 月 30 日, 乌鲁木齐人口总数为 250.68 万人, 其中 194.75 万为常住人口, 55.93 万为流动人口。2008 年,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下辖一个乡(含牧场)及 13 个街道办事处, 共有 144 个社区居委会, 4 个村委会。驻地单位 1060 个。区内居住有汉、维吾尔、回、哈萨克等 44 个民族 52.2 万人,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 15.6 万人, 约占全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¹在市场运作的购房制度下, 总体上看, 大部分商业小区依然是民族混居。据笔者调查, 以团结路街道办事处辖区的大湾昌乐园商业小区为例, 总户数为 2221 户, 总人口为 7470 人, 其中汉族为 4331 人, 维族 1710 人, 回族 1075 人, 哈萨克族 95 人, 蒙古族 7 人, 锡伯族 65 人, 壮族 20 人, 流动人口占 40%左右。

笔者收集了 1982 年和 2008 年的天山区具有代表性街道的民汉人口的分析比较。

表 1、1982 年天山区部分街道办事处隔离指数

街道名称	维	汉	回	维、汉、回比例
胜利路	10138	12970	2341	0.40、0.51、0.09
团结路	25866	9447	2228	0.69、0.25、0.06
和平路	39910	17624	8694	0.13、0.58、0.29
解放南路	10426	9562	6042	0.40、0.37、0.23

资料来源: 新疆人口普查办: 新疆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汇编, 1983 年, 新疆人民出版社, 668 页

表 2、2008 年天山区部分街道办事处各族人口数

街道名称	维	汉	回	维、汉、回比例
胜利路	13100	13400	852	0.48、0.49、0.03
团结路	64000	42000	0	0.60、0.40、0.00
和平路	5500	16000	730	0.25、0.72、0.03
解放南路	9100	12000	540	0.42、0.55、0.02

资料来源: 笔者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政府调查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个数据缺乏流动人口数字, 但是总体上看, 汉族与维吾尔族的常住人口规模比例没有太大变化, 只有回族人口比例大幅下降。1982 年汉族人口为 49603 人, 维吾尔族人口为 50420 人。2008 年, 汉族人口为 83400 人, 维吾尔族人口为 91700 人。26 年来, 汉族人口增长约

¹ <http://www.chinaqhua.cn/xinjiang/tianshanqu.html>

1.7 倍，维吾尔族人口增长 1.8 倍。人口比例增长差别大体相当（这里面还有一个生育率的问题，即维吾尔族家庭可以生两胎）。值得关注的反而是回族人口大量减少，我们通过这些数据可以计算 26 年来天山区主要街道不同民族居住分离指数的变化。¹

表 3、天山区四个街道 1982 年与 2008 年分离指数比较

年份	维、汉	维、回	汉、回
1982	33.66	47.74	21.53
2008	19.39	67.99	50.36

我们可以看出，1982 年和 2008 年相比，呈现出“两升一降”的趋势，维、回的分离指数上升了 20 个百分点，汉、回的分离指数上升了 30 个百分点，而维、汉的分离指数下降了约 14 个百分点。可见，维、汉分离指数的下降是以回族人口大量迁出为条件的。对于回族人口外迁的原因与旧城改造关系重大，据笔者初步调查，1999 年开始至 2003 年，乌鲁木齐市政府投资数亿元对和平南路实施综合改造工程，拆迁和安置了上千户居民，其中相当多数是回族居民，他们搬迁至其它城区居住。对于这一原因，笔者拟另文进行调查。

五、结论

从我们初步研究看，二百多年来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乾隆时期地域并列的“双子城”（满城“巩宁”、汉城“迪化”）到光绪初的省会——单体城市“迪化”，从晚清的“一城四区”发展到民国时期的“一城两区”，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最终完成城市空间的整合。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出其历史的脉络，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构成从族群隔离一直向着族群混居的方向变迁。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后，乌鲁木齐社会空间变化最为显著，并最终形成了民族混居的居住格局。从我们的调查看，并没有出现所谓的乌鲁木齐市南门以南是少数民族高度聚居的社会空间，不能以个别的社区形成了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格局，代替整个天山区几十年来形成的民族混居为主的格局，应当尊重事实。

根据近年来西方学者 Moshe Semyonov、Anya Glikman 对欧洲社会族群居住隔离、族群之间的社会交往、对少数民族态度这几种现象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的研究，验证了若干假设。第一，族群居住隔离（即全欧洲的每一个地方的同类聚居）限制了建立和发展族群间社会交往的机会；第二，积极的族群间的交往可能会减少反少数民族态度产生的机会（即对威胁和社会隔离的看法）；第三，社会交往调节少数民族与邻里的关系及反少数民族的态度。²可以说，这一结论也适用于我们对乌鲁木齐城市空间和族群居住格局的研究。我们应当实事求是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在民族居住格局和民族交往的改善中所作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乌鲁木齐市个别城区形成了若干个类似赛马场这样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相对集中居住的社区，这不利于城市社会空间的整合和民族之间的交往，不仅和历史发展趋势相悖，而且也解放后党和政府采取的民族混居的努力是相抵触的，这是我们需要引起警惕并努力从政策上加以解决。

【调研报告】

¹ 隔离指数（Index of Dissimilarity）是美国社会学家分析城市居住格局经常使用的一个定量指标，表现的是一个居住区（城镇）内各个区域单元（街区）的民族比例与城镇整体民族比例之间的偏差量。实际调查中人们常以城市的街区和自然村为单位计算。关于隔离指数的讨论详见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1996 年，410-412 页。

² Moshe Semyonov、Anya Glikman 所著《族群居住隔离、社会交往及欧洲反少数民族态度》（Ethnic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Social Contacts, and Anti-Minority Attitudes in European Societies），参见马戎等，“2009 年国

新疆城镇发展和双语教育的进程

——南疆地区两个专题调研报告

马 戎

自从本世纪初中央政府开始启动“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主导的能源、交通、通讯、水利、城市建设等大型建设项目推动了新疆城镇的所有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也吸引了大量中部和东部的企业和劳动力进入新疆，新疆城乡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出现了深刻的历史转型。大量汉族人口来到新疆，新疆许多新兴的项目企业由汉族经营，这些汉族流动人口对新疆历史、维吾尔族语言宗教和传统文化普遍十分生疏，但是由于他们在东部市场体制和竞争机制下生活多年，这些汉族人口在汉语交流、适应市场机制、掌握就业技能等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这使他们在新疆城镇各行各业的劳动力市场上具有明显高于当地少数民族就业人员的竞争力，这无疑会对本地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和城乡劳动力形成很大的压力。因此，这些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和汉族劳动力的涌入使新疆的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和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历史阶段（马戎等，2005）。

2009年乌鲁木齐的“7.5事件”对全国人民都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在近十年新疆深刻的社会转型中逐渐积累下来的社会矛盾，这些社会矛盾涉及到新疆社会、经济、文化、城市化、教育、就业、人口流动等许多方面的问题，而且由于直接牵涉到新疆的民族关系，也与我国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等密切相关。这些问题所涉及的方面和领域十分广泛，而且是长期积累而成，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大量深入系统的实地调查中逐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具体可行的调整改善的政策性建议。本文试图通过对两个新疆各族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都十分关心的主题——喀什老城区改造和双语教育来分析当前新疆社会发展和民族交往，并希望能够通过对这两个具体问题的讨论来理解新疆和西部地区社会发展和民族交往中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城市改造和喀什老城区

近十年来，全国各地的许多城市为了提高基础设施的档次，扩宽街道，建设地标性建筑，提高现有居民区的公共设施（上下水、电、天然气、电话、网线、垃圾处理、公共交通、防火和急救条件等），建设新商业区和工业开发区，都在大规模进行老城区的改造与扩建。但是由于许多规划工作简单粗暴，改造规划缺乏透明度，旧房拆迁过程中有时又伴随着行政强制，没有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因此不少城市的旧城改造工作得不到广大居民的认可，在具体实施时极易引发矛盾。

与全国其他地区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一样，新疆近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与城镇发展、特别是现有城市的改造扩建密切相关。新疆自治区有许多城市都在积极推动旧城改造工作，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南疆喀什老城区改造问题工程。喀什地区是我国维吾尔族人口的主要聚居地，喀什市也是南疆的维吾尔传统文化中心（马戎，2000），有的老人告诉我们，老城区有些房子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一些维族知识分子把喀什老城区的民居建筑群比喻为“维吾尔族传统居住区建筑风貌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也正因为如此，喀什老城区改造工程不仅在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中激

外社会学的族群研究回顾”，《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79期，2011年1月。

起很大反响，而且也得到国外媒体和学术界的关注。因此，喀什市老城区改造已经成为新疆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而敏感的议题。2010年8月，我们在新疆喀什市对该市老城区改造问题开展了实地调研访谈，实地考察了拆迁现场，与多名老城区居民座谈，并访谈了主持老城区改建设计的维族工程师。

（一）从政府的设想和巨大投入来看，喀什市老城区改造项目是一项“惠民工程”

首先，老城区有相当数量居民住房老旧破败，建造时使用的木材和土坯已超过使用年限，使这些房屋成为危房，不仅无法抵御地震破坏，有的随时有倒塌风险。其次，老城区有相当部分街区道路狭窄弯曲，无法出入消防和急救车辆，一旦发生火灾或重症病人，无法及时灭火或进行急救，将造成居民生命和财产损失；第三，老城区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许多住宅缺乏完善安全的电力、天然气、通讯、上下水管道等设施，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从这三个方面看，喀什市开展老城区改造，是城镇建设和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需要，政府拨出大量资金推动老城区改造，从立项角度看，是一项必须充分肯定的“惠民工程”。

（二）政府在老城区改造项目中的具体做法

老城区改造项目经过长期论证与讨论，实施方案也经过多次修订。我们2010年8月调查时了解的情况如下：（1）喀什市城建部门、建设设计院等单位合作设计制定老城区改造整体规划，

（2）对规划区域涉及的居民住房进行评估勘测，部分有历史价值而且比较坚固的房屋予以保留或助资维修；部分在80-90年代改建或新建的质量较好的房屋予以保留，确定需要拆除改建的简陋或有危险的房屋，（3）通过街道-居委会和改造项目办公室，对需要拆掉改建的房屋进行丈量，确定补助面积和补助数额，（4）为保存老城区传统建筑风貌，设计部门对在原址重建的居民住房进行“一对一”的住房设计，请居民提出房屋外观图样，由建筑设计部门参照图样进行免费的单体房屋设计；（5）设计方案确定后，政府与住户拆建签订合同；（6）因道路扩展和公共用地造成部分居民房基地面积减少，由政府提供补偿，砖结构住房每平方米700元，土木结构每平方米580元；

（7）在原址重建施工中，政府提供每平方米400元的补助，不足部分由居民自筹；（8）在重建过程中，政府为居民提供6个月的周转住房，每月租金500元；（9）2009年及以前的拆建工程由本地少数民族施工队负责施工，2010年因民族施工队力量不够，吸收本地汉族施工队参与，维族施工队和汉族施工队的比例大致为六比四。

从以上情况来看，应当说政府主管部门已经考虑到民众关心的许多方面：（1）“一对一”的房屋单体设计防止了单调一致的外观风格，可按照居民的意愿和原来房屋风格予以重建，不会对喀什老城区维族传统建筑风貌造成破坏；（2）有历史文化价值、比较坚固的一批住房得以保留，是有选择的重建；（3）政府对重建给予资金补助，拆建期间安排周转房，对改建造成的面积减少给予补偿，对愿意从老城区搬到政府新建楼房的住户，政府提供条件并给予补偿。

（三）民众反映在拆建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与不满。

既然改建项目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具体问题，政府都已经予以考虑并做出相应安排，为什么当地部分居民和维族知识分子对喀什市老城区改造项目还有那么多意见？问题主要出在哪里？我们在和当地居民的访谈中，主要讨论的就是存在的问题。

在项目实施方面，民众在访谈中提出的问题和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1. 对需拆建的住房面积进行测量核实时，一些居民反映新测的面积少于实际面积。

居民自己的测量数据和方法（包括庭院、阳台等的折算方法）可能与政府部门测量的结果有出入，这在住房拆建中是经常发生的现象，需经过各方的讨论、核对和解释来解决分歧。但是有些居民反映新核实的面积比过去政府正式颁发的《房产证》上注明的面积还小，表示不能接受，希望按照《房产证》上的面积计算。有些居民反映，在丈量时如果给具体工作人员行贿，量出的面积就比较合理甚至比实际面积还大。这主要反映了房屋丈量核对工作的细致程度和具体工作人员的素质和不正之风问题，政府需要给予重视，及时接收民众投诉，可以组织几个核查小组对这

类投诉进行处理，努力把住房实际面积的测量与核对工作做好，体现政府工作的公开、透明和公正。

2. 一些与政府签署正式合同明确“原址重建”的居民住房，政府中途不履行合约，以“公共绿地”或“公共设施”建设为理由，要求居民放弃“原址重建”，接受补偿另购住房。

这一现象反映出街区改造规划的制定不慎重，许多方面考虑不周到，导致在签订合同之后，规划内容仍在改动。但是政府既然已经与居民签订了正式合同，只能与居民协商，动员居民在自愿基础上与政府签订新合同，如居民坚持履行原合同，政府只能按合同办事，决不能以行政压力单方面撕毁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合同。这一现象反映出来的是政府公务员的政治素质和法律意识问题。

据部分居民反映：一些以“公共绿地”或“公共设施”建设占地为理由，在与住户协商时说服住户放弃“原址重建”的房基地。但是政府部门（街道、国土资源部门等）不久又卖给房地产开发商，转为商业用地，有关部门和经手个人都以此获得高额收入。居民得知这些土地的实际用途后非常气愤，因为他们得到的补偿标准是“公共用地”的补偿标准，远低于商业用地的标准。他们举例说，2004年政府要求艾提尕尔清真寺周边居民把住房卖给政府，用作清真寺建设用地，补偿标准是土木结构每平米220元，砖结构420元。但政府最后把这些宅基地卖给开发商建造商店出租，售价最高为每平米2.8万元，当时接受拆迁的居民对此非常不满。

为了防止征地时的说法与后来实际用途之间出现差距并导致纠纷，政府应当从一开始即向社会公众正式公开老城区的改建规划，使每块土地的规划用途公开透明，既有利于公众和社会监督规划的实施，也可杜绝一些无根据的谣言在民间的恶性传播，建立政府和社会间的互信。现在群众有些疑问，政府应尽快对老城区改建规划予以公布，亡羊补牢，犹为未晚。

现在全国各地政府普遍把土地作为重要收入来源，主要方法就是从农民或城市居民中低价获得土地，再高价卖给开发商。这样对原土地使用者和房屋所有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这也是许多地区和城市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发生法律纠纷甚至严重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喀什老城区住户均为本地维族居民，改建工程得到维族民众和国外媒体广泛关注，如果政府部门在老城区土地使用、转让过程中一些法律程序、补偿措施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

3. 由于政府提供的重建补助标准低，一些低收入住户无力完成住房重建，无法入住。

据介绍，按照目前的建筑成本，目前每平米400元的补助资金只能建起四面砖结构墙体（有的可以把第一层封顶），门窗和内部装修的费用仍需住户自筹（2万元以上），如重建二层，经费需完全自筹。我们访谈的住户和规划设计专家估计：大约有10-20%的重建住户经济实力较强，即使政府不资助，他们也计划重建，政府补贴是“锦上添花”，帮他们省了钱；另有40-45%的住户并不富裕，但是通过银行贷款或从亲友借钱，仍可勉强完成住房重建，但重建使他们欠下债务，对今后生活有明显影响；同时约有30-35%的住户经济困难，无处筹措建房经费，造成工程停顿。我们在老城区看到有部分已经建成墙体的施工现场长期无法完成工程，甚至二层没有封顶。

目前有相当比例的居民无法完成住房重建，无法入住，这是喀什市政府必须及时解决的一个严重的民生问题。目前有两个方法可供选择：一是统一提高重建补助标准，但是这将涉及所有的重建户，连那些已经建好、经济富裕的住户也需要补发补助，这会涉及原来制定补助标准的合理性问题及责任的追究，并将增加政府大量资金的投入；二是对那些确实困难的住户（30%左右）提供长期无息银行贷款，帮助他们及时完成住房重建并入住，之后再根据每个具体住户的经济收入情况（如低保户、贫困户等）逐步减免贷款。我们觉得第二种方法比较可行，涉及的户数较少，也不是无偿资助，还贷时可根据情况零星个案处理进行减免，避免引起社会群体性动荡和反弹。

4. 部分居民对重建结构设计、施工质量的反映

(1) 设计：喀什老城区居民住房，绝大多数是传统的土坯木框架结构，有的墙体厚达70-100厘米，冬暖夏凉，居民说冬天院里水缸也不结冰，夏天十分凉爽，与当地气候特点十分相宜，有

节能效果。同时，厚土墙在室内可设计各式龛室，放置铜壶、瓷器等工艺品，成为维吾尔民居的传统特色。而新设计施工均为砖墙，厚度 24 厘米，许多传统民居的室内装饰无法保留，从维族传统建筑和民居文化的继承方面将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同时新建砖墙很薄，隔热防寒效果差，居住并不舒适而且浪费能源。但据一位设计工程师讲，新式砖墙的好处是节约建筑材料，同时可以扩大室内面积。对新旧设计的利弊，人们各执一词。

其实，只要木料结实，对土坯墙注意维护，喀什老城的传统维族民居是相当坚固耐用的，这是当地居民在几百年居住中逐步总结发展出来的建筑形式，那些通过鉴定达到了一定抗震能力的传统土木结构住房，也应当允许保存乃至重建。在住房结构设计方面，政府需要充分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在喀什老城区保留一些多样化的建筑风格，并没有什么不好。

(2) 质量：一些居民反映新建住房的墙体只有 24 厘米厚，中间的钢筋很细，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施工墙体立柱中的钢筋直径约为 1-1.5 厘米。一些居民对这样的结构设计和施工质量能够达到政府宣传的“抗震安居”效果表示怀疑。我们不是建筑专家，因此对这样的住房质量无法评价，但是需要指出，现在我国建筑行业（特别是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建筑施工）的质量问题比较突出，人们对“豆腐渣工程”的担心是十分自然的。在设计与施工质量问题上，政府应当向居民有所说明并切实承担起监管职责。假如这些新建的房屋今后在地震或因其他情况出现不应发生的损坏倒塌（即证明没有达到设计标准），作为老城区改建项目的主持者和推动者，地方政府将不可避免地承担一定责任。

5. 关于部分老城区居民置换到郊区后的生计问题

部分经济条件较差（如低保户）、原住房面积较小（小于 50 平米）的喀什老城区住户，在拆迁重建过程中放弃“原址重建”而选择迁入政府提供的位于郊区的楼房公寓。但是由于这次搬迁改变了他们的就业环境，这些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出现了收入难以维持生活的情况。过去这些居民住在老城区，可就近通过沿街出售干果、烤馕等小生意或打零工维持生计，现在迁到郊区楼房，如继续进城做小生意或打零工每月需支出公共交通费 120 元（每天 4 元），新居的物业费每月 10-11.50 元，而政府的低保补助每月仅为 140 元，这样算下来，一些困难的低保户连吃饭都成问题，因此当他们住所的公寓设施（水管、龙头等）损坏后，他们也无钱修理。

现在喀什物价很高，我们在市场上看到一公斤羊肉卖 45 元，一公斤本地产的桃子 23 元。希望政府考虑到当地物价实际情况，在具体调查的基础上制定新政策，对这些迁到郊区的低保户适当提高低保补助标准。

6. 关于施工进度问题

根据居民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政府对“原址重建”部分的居民提供 6 个月周转住房和租金补助。但是部分居民反映，有的住房已经拖了一年多仍未完成施工，无法回迁入住，这些居民意见很大。据反映有的居民甚至给居委会干部送钱，请他们帮助推动施工进度。

据了解政府已经采取措施，为一部分周转期满但仍无法入住的居民延长了周转房的使用期和租金补助。但是为了履行合同并切实解决“原址重建”居民的回迁问题，施工工程进度的监督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强。

7. 改造项目各项工作在具体推动中出现的工作作风问题

此外，民众反映在具体工作中也出现干部工作作风问题：（1）整个老城区改建工程规划不公开不透明，土地具体用途的说法多变，签订的合同不认真履行；（2）在决定一些房屋是拆还是保留时，干部拍板的随意性很强，有的居民给有关部门和人员送了钱，托了关系，就可以把住房纳入“有历史保护价值”的范围而避免拆迁；（3）在动员过程中，居委会干部每动员一户居民拆迁可得奖金 200-500 元，干部对此项工作积极性高，在过程中对住户施加各种压力；（4）有的住户因为拒签合同，遭遇断水断电。以上现象反映出当地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工作作风问题。此外，老城区原有 37 个经文学校，在改建中全部拆掉，有的市文物所上报批准的传统文化遗产也未能保

留，部分民众对此有意见，我们在老城区也去实地看了这些拆迁工地，旁边有市文物所过去立的“某某历史遗址”的牌子。民众和当地知识分子的这些意见也值得政府重视。

2010年春天新上任的自治区张春贤书记曾来喀什市，对老城区改造项目表过态，指出这一项目的实施必须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开展”，一些访谈的维族老人对此报以很高期望。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然要推动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这是发展趋势。由于我国许多城市的老城区人口过于拥挤、基础设施陈旧、抗震防火能力低，所以旧城区改造是我国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许多历史上留下来的老城区，无论在街道格局、建筑风格、施工工艺、内部装修等许多方面都是当地传统民居文化的重要载体，一旦拆除，不可重现，很可能是我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大损失。在这方面，我们内地许多城市（包括北京）已经犯过了许多不可挽回的错误，喀什老城区是维吾尔建筑和民居文化的精粹，如果都变成与内地同样规格的砖瓦结构，即使在外观上保留一些传统形式，内部结构也必然无法继承原来的传统风格，这很可能也将成为日后的遗憾。

基于以前的教训，喀什老城区的改建过程应该适当放慢速度，同时政府可聘请各族学者和建筑学家参与讨论老城区的改建方案，在街区规划和房屋结构设计等方面提出最佳方案并取得大多数人的共识与支持，在此基础上稳步渐进地推动改建项目。放慢速度、广征民意，稳步发展，共同推进。如果老城区改建项目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来推动，这对当地干部在自己任期内“基建政绩”的期待可能贡献小一些，但是对于党和政府的威信和“民心政绩”肯定会加分许多。与此同时，建议市政府在喀什报纸上公布举报电话、设置相应办公室，及时受理居民对相关问题的反映与投诉。

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老城区改建这个完全是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项目，更应该广泛征求民众的意见，争取民众的支持和参与，这样才能使这个本意是改善民众居住条件、政府做了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的老城区改造项目成为得到广大维族知识分子和民众拥护的真正的“惠民工程”。

任何古老建筑都有自己独特的风范，如何在建设现代化城市的同时保护好古城的文化与历史，中国其他城市也曾面临类似的问题，如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改造、西安“回坊”改造等（李健彪，2009）。喀什老城区居民对他们几代人出生、成长的房屋注入很深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使是窄小、弯曲的巷道也凝集着当地居民的儿时回忆，不规整的土坯墙也已成为戈壁民族建筑文化的一个侧面，雕花木梁和墙内龛室中的民族工艺品展示着一个民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如果人类的城市和房屋都依据建筑效率和经济成本的原则改建成整齐划一的建筑式样，那么人类的文化生活将是多么贫乏和苍白。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恰恰是老城区这些外观古旧、内部多变的传统民居，将是喀什发展旅游观光业的亮点。我们切切不要为了短期的经济效益和官员的“政绩”，使这些历史遗产永远消失。

喀什市老城区的改建已经成为维吾尔族精英和民众最关注的议题之一，面临类似问题的我国其他民族对喀什老城区改建工程的社会效果也非常关注，同时也是境外各类势力炒作的题目，这一工程实施效果如何，可以说已经不仅仅是关系到喀什一个城市的问题，而是与整个新疆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国际形象等等都紧密相关。

二、新疆双语教育问题

2007年夏天，我们在新疆开展了“双语教学”实地调研，并发表了调研报告（马戎，2008）。2010年8月，我们在新疆（主要是南疆）对双语教育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又进行实地调查访谈。现将两次调查所得出的主要观点和看到的主要问题归纳如下：

（一）双语教育是多民族国家必然发展趋势，加强族际共同语（汉语）学习是就业市场的客

观要求

社会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激烈竞争中，中国各民族间必然要不断加强政治、经济、文化整合继承。汉语文作为中国各族在交流学习中需要掌握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族学习现代知识和技能 and 实现就业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和传统的民语教育系统加强汉语教学和推行双语教育已成为发展方向。同时，在有条件时需要推动外语学习。

在包括大中专毕业生在内的劳动力就业已完全市场化这一宏观社会环境下，新疆民语教育系统各级毕业生就业面临极大困难并由此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加强双语教学可以提高少数民族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这一思路是正确的。新疆自本世纪初开始加强双语教学，从大学的汉语授课逐步推广到中学、小学和学前双语教学，这一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加强双语教育的发展，其意义正如温总理所说：“这是关系每个少数民族家庭、每个少数民族青少年切身利益的大事，同时对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意义重大”。

（二）新疆中小学义务教育的几种语言教学模式

目前在新疆各地区中小学教学采用以下几种语言教学模式：

- 1. 传统民语教育模式：**各门课程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学习，小学三年级开始上汉语文课；
- 2. 传统汉语教育模式：**各门课程使用汉语教学，开设外语课；
- 3. 双语教育模式一：**理科课程（小学数学、科学、信息技术，初中数理化、生物、信息技术、外语）和汉语课使用汉语授课，其他课程（语文、品德与生活、体育、艺术、地方课程、综合实践、历史、地理）使用民语授课；小学一年级同时开设汉语文（每周7节）和民族语文课（每周5节），初中汉语文课每周6节、民族语文课每周4节。
- 4. 双语教育模式二：**“民族语文用民语授课；音乐等课程中涉及民族传统音乐和传统文化的内容，可以用民语教授。其他课程使用汉语授课”。
- 5. 双语教育模式三：**全部课程使用汉语授课，开设民族语文课程。小学一年级开设汉语文（每周7节），三年级开设民族语文课（每周2节）和外语课（每周2节），初中汉语文课每周6节、民族语文课每周2节、外语课每周3节（各类模式定义和具体课程设置方案见新疆教育厅文件2007年第50号）。

从熟练掌握两种语言文字的角度来看，**模式一**（汉语学习数理化、母语学习文科）是培养双语人才的有效模式。用汉语开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专业技能类课程，可以使学生适应劳动力市场对汉语和知识交流的要求，而用母语开设历史、思想品德、地理、地方课程，可以保证学生对母语和传统文化的继承。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双语教育”模式，可以培养出熟练掌握两种语言的各类人才，同时这一模式是我们在调查中绝大多数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和干部表示支持和接受的语言教学模式。

模式三则是以汉语文教学为主导的语言教学模式，除了一门母语课外，学生所获得的全部知识都是使用汉语文学习，这对学生掌握现代化科学知识、进入就业市场十分有利，但是对本民族语言和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存在明显的负面影响。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和中亚邻国、伊斯兰教世界进行交流合作的文化桥梁，从长远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的弱化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同时少数民族知识阶层在感情上也难以接受。因此，在目前发展阶段，在南疆这样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可以同时保留模式一和模式三，招生比例可根据当地民众的意愿确定，以兼顾就业市场对汉语的要求和继承民族传统文化两个方面的需要。

（三）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共同繁荣这两条基本原则来综合妥善规划新疆地区的双语教育工作，根据不同地区的民族构成实行不同的语言教学模式

语言的学习和运用需要一定的语言环境，新疆各地区人口的民族构成差别很大，不宜实行“一

刀切”的制度安排。维吾尔族聚居在南疆和田（97%）、喀什（90%）、阿克苏（73%）、克孜勒苏（64%）和东部吐鲁番（70%），哈萨克族集中在北疆的阿勒泰、塔城和伊犁地区。考虑到当地人口的民族构成，政府教育部门需要根据各地区城镇、乡村各自不同的民族构成和语言环境条件，设计多种教学模式（各科目教学语言构成），由各地依据本地实际情况（语言环境、师资状况）和实践效果，**实事求是**地予以选择。

以乌鲁木齐市和南疆4地州的情况为例，可对各级学校的语言教学模式提出以下设想。

表 1、乌鲁木齐市和南疆 4 地州各级学校语言教学模式设想

	汉语教学模式	民语教学模式	模式一	模式三
乌鲁木齐市 汉族聚居区 维族聚居区	√		√	√
南疆 4 地州 城市 县城 乡镇中心小学 村小学	√ √	√	√ √ √ √	√

究竟在一个地区究竟采用哪一种模式最符合“实事求是”精神和民众的愿望，完全取决于对当地人口的民族构成、语言环境和就业市场的语言要求。如乌鲁木齐市汉族聚居区，可保持传统汉语教学模式，但考虑到乌鲁木齐市有 13%的维族（不包括流动人口），在维族聚居区的小学可根据需要分别采用模式一（父母不会汉语的城市居民和南疆流动人口子女）和模式三（城市维族干部职工子女）。

南疆地区政府所在地的城市（如喀什市、阿克苏市），对维族学生可分别采用模式一（父母不会汉语的城镇居民和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和模式三（城市维族干部职工子女）。据我们今年 8 月调查，县城中小学并没有充足的双语教学师资，全面推行模式三的难度极大。因此县城和乡镇中心小学，从语言环境和师资力量看，在今后几年内，模式一是确实可行的教学模式。而在村小学，可能完全采用真正合格的模式一的条件也不成熟，很可能是传统民语教学模式和模式一同时并行。

（四）中央提出的新疆“双语教育”发展目标

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到 2012 年基本普及学前两年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本民族语言文字为辅的双语教学，并加快对少数民族中小學生实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加授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双语教育步伐，加快解决新疆特别是困难地区中小學校双语教学师资短缺问题，到 2015 年基本普及双语教育”。温总理强调“中央提出到 2012 年在新疆基本普及学前两年双语教育，2015 年基本普及双语教育，2020 年使少数民族学生基本熟练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中央领导对新疆教育工作提出的总体目标。

在中央提出的发展目标后，如何在新疆各地区加以具体落实，仍然需要根据各地的客观条件和可行性，制定各地区的具体发展规划。

（五）为了发展双语教育，地方教育部门所能够做到的努力

新疆各地州（特别是南疆各地州）把双语教育作为中心任务之一来积极落实。

自 2000 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就开始大力推动双语教育。2004 年双语教学班（模式一）就读学生数为 35,948 人，2005 年 9 月增长为 145,138 人，一年内即增长 4 倍。2008 年“双语”教学班总数已达 5,000 个，就读少数民族学生达到 15 万人，仅占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 6.6%。因此，要想在几年时间内用模式三全面取代模式一（6.6%）和传统民语模式（87.6%）（另有 5.8% 的少数民族学生在汉校就读），将需要几十万名真正合格的民汉兼通又熟悉专业教学的教师。仅

阿克苏地区 2010 年就提出需要双语教师 11706 名。全自治区的缺口还需要仔细推算。

1. 现在各地县教育局关注的矛盾焦点

主要焦点集中在 5 岁、6 岁的“学前双语班”和 2010 年一年级新生班的“模式三”教学。根据自治区的要求：2010 年 5-6 岁学前儿童必须全部进入“双语学前班”，层层负责，定下考核指标，压给县市政府。9 月份兑现，10 月份考核。没有教师，就从小学教师中抽调，或者从县市在职干部中抽调。同时要求 2010 年的一年级入学新生班，必须全部实行模式三（即全部课程都用汉语授课，三年级开始加授维语文课）。这相当于在三个年级（二个学前年级、一个小学一年级）同时推行全面汉语教学，可以想像，这三个年级所需的教师队伍是多大的一个规模。

我们在南疆的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调查和学校访谈发现，这几乎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县教育局为了为在 9 月份为这三年级配备必要的汉语授课教师，采取了以下办法：

- (1) 把在高年级的“双语班”（模式一）和民语班的汉语文课老师都抽调出来。
- (2) 增加教师的课时量，从过去每周 15-18 节增加到现在的平均 25 节（每天 5 节）。

如果把五、六年级的“双语班”（模式一）的汉语课和（汉语）数学课的现有教师抽调走，那么这些年级的教学怎么办？在我们列席的温宿县教育局召开的校长座谈会上，校长们提出两个建议：

一是重新在 5-6 年级用维语上数学课，从模式一退回到传统民语模式，但是学生已经在一至四年级以模式一用汉语学习了数学课，现在退回去，家长和学生的阻力肯定很大。

二是在形式上保留模式一的“双语班”数学教学，课本用汉文课本，但上课用维语讲解。这又出现一个如何考试的问题，是否允许用维文数学考卷？这也是从模式一退回到传统的民语授课了。

如果为了在低年级推行模式三，结果是使已经实行多年的“双语教学”（模式一）在高年级退回到传统民语模式，这恐怕不是中央希望的新疆双语教育的“进步”。

2. 2010 年的问题解决了，今后几年怎么办？

而且，2010 年在一年级推行模式三，就已经对高年级的汉语教学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么，随着模式三今后从一年级逐年提高到六年级，几乎需要增加 4 到 5 倍的双语教师，之后再提高到初三由需要更多教师。在学前教育阶段，除了需要聘用大量合格教师外，这存在一个编制问题。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由于南疆基层学校的许多维族教师不能适应汉语教学要求，解决双语教师的方法之一是对现有教师进行培训，不足的部分需要进行招聘，那些经过培训后仍不能适应汉语教学要求的部分教师还存在一个妥善安置的问题。

学 年	项目		小学									初中				高中			
	学前班	合计	1年级	2年级	3年级	4年级	5年级	6年级	合计	7年级	8年级	9年级	合计	高一	高二	高三	合计		
2009—2010学年	2770	2480	5250	163						163									
2010—2011学年	2881	2770	5651	844	163					1007									
2011—2012学年	2996	2881	5877	2770	844	163				3777									
2012—2013学年	3116	2996	6112	2881	2770	844	163			6658									
2013—2014学年	3241	3116	6356	2996	2881	2770	844	163		9654									
2014—2015学年	3370	3241	6611	3116	2996	2881	2770	844	163	12770									
2015—2016学年	3505	3370	6875	3241	3116	2996	2881	2770	844	15848	163			163					
2016—2017学年	3645	3505	7150	3370	3241	3116	2996	2881	2770	18374	844	163		1007					
2017—2018学年	3791	3645	7436	3505	3370	3241	3116	2996	2881	19109	2770	844	163	3777					
2018—2019学年	3943	3791	7734	3645	3505	3370	3241	3116	2996	19873	2881	2770	844	6495	163		163		
2019—2020学年	4100	3943	8043	3791	3645	3505	3370	3241	3116	20668	2996	2881	2770	8647	844	163	1007		

根据阿克苏地区温宿县中小学各年级自2009-2010年实行模式三的学生人数逐年增加的规模和师生比推算，该县（模式三）各教学年所需教师数量见下表。

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模式三）各教学年所需教师预测

学年	学前班		小学		初中		所需教师总数
	学生数	教师数	学生数	教师数	学生数	教师数	
2009-2010	5250	250	163	9	0	0	259
2010-2011	5651	269	1007	53	0	0	322
2011-2012	5877	280	3777	199	0	0	479
2012-2013	6112	291	6658	350	0	0	641
2013-2014	6356	303	9654	508	0	0	811
2014-2015	6611	315	12770	672	0	0	987
2015-2016	6875	327	15848	834	163	12	1173
2016-2017	7150	340	18374	967	1007	72	1379
2017-2018	7426	354	19109	1006	3777	270	1630
2018-2019	7734	368	19873	1046	6495	464	1878
2019-2020	8043	383	20668	1088	8647	618	2089

（教师-学生比例：初中1：14，小学1：19，学前班1：21）

据县教育局的总结材料，2009-2010年度，该县学前适龄儿童入（园）班人数为2929人，2010年秋季将覆盖学前两年幼儿4530名（占适龄学童5651人的80%），开设151个班，现缺专任教师205名。从表中可看到，当2010-2011学年只需要322名教师时，就缺205名教师。即使是2010年秋季只在该县18个乡镇中心小学推行模式三，将有25个班，学生859人，仍需134名教师，解决60名，尚缺74名。2011年秋季学期，全县一年级“双语”模式三教学班将达107个，学生2987名，共缺专任教师749名。

由于每年都要增加一个年级的新生，2019-2020学年需要2089名双语班教师，每年增加的教师从哪里来？教育局长说，他们只能考虑如何应付今年的检查，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温宿县是距阿克苏市仅几十公里的相对发达的一个县，如果南疆4地州的29个县都需要全面推行模式三，所需教师的巨大缺口将如何解决？

另外，合格的双语教师是必须熟练掌握两种语言，并熟悉所授专业（数学、物理、化学等）教学内容的教师。能讲汉语、识汉字的人并不一定是合格的汉语文教师，否则就不需要师范学校的专业培养了。现在最大的瓶颈，就是极度缺乏掌握民族语言的汉族教师（“汉考民”），这是几十年汉语学校不开民族语文课所造成的后果。同时，也缺乏熟练掌握汉语文的维族教师，2005年“民考汉”学生在少数民族在校生总数中只占5.8%（13万人），其中许多人考入大学，毕业后因为待遇低而不愿意到基层学校任教，所以在县级及以下的中小学校中，“民考汉”教师也是凤毛麟角。

3. 目前的模式一和即将开始的模式三教学，存在不可忽视的教学质量问题

现在虽然各教育局和各学校组织配备了“双语教师”，课程教学也已经在推行之中。但是我们了解，各级的汉语教学和汉语授课的数理化教学中，由于教师的素质和语言能力不能达到标准，教学质量和学生的成绩存在很大问题。

我们座谈的对象大多是给模式一和模式三中使用汉语上课的维族教师，但是除了个别“民考汉”教师和在大学汉语专业学习过的人员外，大多数教师和我们之间的口头交流仍需借助翻译。由此可见，目前汉语授课的维族教师的汉语能力仍是比较弱的，这无疑会影响教学质量。

据我们了解，疏勒县英尔力克乡中学初二的一个普通班有48名学生，汉语文成绩及格的约10%，维语文及格的约80%，数学（维语教）及格有15%。疏勒县牙曼亚乡中心小学三年级一个双语班有47名学生，数学及格80%，汉语文47名学生中只有17名及格（36%），维语文有45名及格（96%）；六年级一个普通班（强化班，准备考内地初中班）32名同学，汉语及格20%，

数学及格 80%，维语文及格 90%。

在前几年高速推行模式一的过程中，已经造成了合格教师的重大缺口，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和学生成绩，如果在今后几年再不顾客观条件（主要是师资条件）强行全面推行模式三。其后果必然更为严重。我们必须对这上百万的孩子的学习效果 and 未来发展负责。我们在当地教育局会议室的墙上看到“一切为了孩子”的巨大标语，这应当是我们考虑一切教育工作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六）今后的改进建议

1. 建议对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以参与双语教育的合格教师队伍进行全面调查

对 2000-2009 年实施模式一的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成绩进行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确定双语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准绳来对过去几年实施的双语教学的成绩和问题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反思，特别是对（1）教师队伍的状况（学历、语言能力、专业知识、教学效果），（2）学生情况（语言能力、学习成绩和对教学模式的想法），（3）教育管理部门（课程设置、教材结构与内容、教学辅助条件与设施等），（4）家长与社会对双语教育的意见与建议（模式选择、对学校管理、课程设置、教学质量等）。通过以上调查研究，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发现目前存在的问题，分析和讨论改进方法

2. 总结出若干个双语教学模式，由各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师资、学生语言能力）选择教学模式和推行速度

在大量、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区人口的民族构成、语言环境、就业的语言需求等因素，提出若干个双语教学模式，供各地区“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本地的教学模式和“双语教学”的推进速度，经详细论证后上报主管部门，审批后实施。在这一过程中，可组织有教师、教育部门人员、教育学研究人员、劳动就业部门等各方面参与的“双语教育发展研讨会”，讨论实行模式一和模式三需要什么条件？哪些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只能推行模式一，哪些地区可以适度推行模式三。这些问题都是只有通过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才可以得到回答和做出结论的。

选择教学模式和加强汉语教学的推进速度，必须“实事求是”，注重实际条件和学习效果，也要考虑当地民众的自愿程度，不能盲目追求模式三和推进速度。乌鲁木齐和北疆主要城市可能完全适宜推行模式三，而南疆主要城市根据不同街区可能需要同时保持模式一和模式三，南疆县城小学可能目前只能实行和巩固模式一，乡镇中心小学和村小学可能只能模式一和传统民语模式并行。群众目前对推广模式三有疑虑，主要是担心教学效果。南疆维族民众对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已有充分认识，愿意送孩子学汉语的积极性很高，只要客观条件确实具备，学习效果好，双语教育和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南疆地区是完全没有阻力的。

3. 努力改善双语教师培训项目的教学效果，对年级偏大和培训后仍无法适应双语教学要求的部分教师进行妥善安置

在基层调查时，许多少数民族教师对目前各级教育部门组织的“双语教师培训”项目的组织方式、师资质量和教学效果提出意见和建议。指出许多培训模式仍是“应试教育”，进修教师的汉语听力和表达能力并没有质的提高，有些用钱买假证书应付考核。因此需要对这些培训项目进行整顿和提高。

目前政策是对 35 岁以下的少数民族教师进行双语教学培训，但是那些年级偏大、无法适应双语教学的少数民族教师需要进行妥善安置，使他们在新的岗位上能够保持自尊而且不降低原有的收入水平。部分教师离开教学岗位，这是教育体制转型中不可避免的岗位调整，这些教师过去辛辛苦苦地教学，对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对他们的贡献必须肯定。“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处理社会变革、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方法。

4. 建议改变“双语教学”单向学习模式，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南疆、北疆）的汉语学校开设当地民族语文课。

在南疆等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 90% 以上，当地政府部门和其他行业非常需要熟练掌握双语的人才，现在只要求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汉族学校不学习民族语文，是“单向学习”模式。如果这些地区的汉语学校开设民族语文课，不仅体现了民族平等，而且可培养一大批掌握维语、哈语

的汉族人才，对加强政府各项工作和许多行业在新疆的发展非常有利。特别是可以为未来培养出一大批民汉兼通的双语教师队伍。根据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来看，这是一个改善中国民族关系的一个战略性举措。

5. 建议政府大幅度提高基层教师的收入与福利。

为了吸引区外汉族教师和区内“民考汉”毕业生投身于新疆基层的双语教学，政府需要对基层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福利和其他各项待遇予以大幅度提高，使基层中小学教师成为一个令人羡慕、受人尊敬的职业，这样既可以稳定现有的教师队伍，同时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和大中专毕业生加入教师队伍。

我们调查的学前班教师收入每月约 600-800 元，小学教师每月 1200 元，中学教师每月 1500 元。以当地的物价和日益抬高的房价来看，还不够吸引人，需要进一步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工作量很大，每周 15-25 课时，他们的工作是管理和教育尚未成年、有的是连生活也未能自理的中小學生，非常辛苦，确实有必要大幅度提高教师工资。现在教育经费已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中央政府完全有条件拨出部分资金，用于提高和改善边疆地区教师的工资和待遇。

我们在近期的实地调查中，感到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双语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很多，许多教师、校长甚至教育局长们对目前自治区提出的全面推行模式三的要求都持很大的保留意见。当地一个流行的口号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种发愤图强的精神是好的，但是在科学面前，我们不能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不能在新疆的少数民族教育问题上重复 1957 年“大炼钢铁”的“大跃进”所走过的弯路。

中央领导提出的要求是“到 2012 年在新疆基本普及学前两年双语教育，2015 年基本普及双语教育，2020 年使少数民族学生基本熟练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里有两点需要思考，一是如何理解“双语教育”，模式一同样是双语教育，不一定片面强调模式三；二是“基本普及”、“基本熟练掌握和使用”，在全新疆自治区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学生分别通过模式三和模式一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汉语知识，也可以说就达到了中央领导提出的目标。而且最重要的，并不是比照中央文件如何要求，而是需要考虑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怎样能够使学生学习得最好，在就业市场上得到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只有达到了这样社会效果，我们的双语教育和政府工作才会得到广大少数民族民众和学生的衷心拥护与支持。这才是真正达到了中央政府提出的要求，也必然会为中央政府赢得威信。

结束语

以上是我们根据 2010 年 8 月在南疆地区的实地调查所写的专题调研报告，由于时间紧迫，有些方面的细节还没有机会深入了解，但是即使从以上比较粗浅的资料和访谈信息中，我们仍然能够对喀什老城区改建和南疆双语教育推行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给予关心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克服存在的问题，更加稳健地推动这两项工作。南疆的稳定和发展得到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像喀什老城区改造和双语教育这些工作，从根本上来讲都是利民惠民、推动民众就业发展的好事，如果具体工作做得深入细致周到，一定能够得到民众的欢迎和支持，但是如果缺乏调查研究，简单地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很可能引发群众的不满，这对政府的威信和工作的实际效果都是不利的。

参考书目：

- 李健彪，2009，“历史街区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并不相悖”，《中国民族报》2009 年 12 月 4 日。
- 马戎，2000，“新疆喀什地区的民族人口分布”，《西北民族研究》2000 年第 2 期，第 1-9 页
- 马戎等，2005，“新疆乌鲁木齐市流动人口的结构特征与就业状况”，《西北民族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5-42 页。
- 马戎，2008，“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和双语教育的实践”，《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 年第 2 期，第 2-41 页。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80期目录

第1期(1995-10)	
中国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研究会成立	
第2期(1995-11)	
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民族社会学	马戎
第3期(1996-3)	
三访赤峰	费孝通
关于建立中国民族社会学数据库的设想和倡议	郑凡
第4期(1996-8)	
但开风气不为师——费孝通学科建设思想访谈	潘乃谷
第5期(1996-11)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与都市化	周大鸣
关于分离指数的计算方法	马戎
认知、态度与行为	郭建如
安图县教育发展状况	于长江
第6期(1996-12-31)	
简述我的民族研究和思考	费孝通
“Kappas”指数的计算与应用	马戎
挖掘移民社区新的内涵	李艳红
欧洲中心论及其化身：社会科学的两难困境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刘能译
第7期(1997-6)	
社会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的亲和及其生命力	周星
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	谢泳
近代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口下降的文化因素	张敦福
当代新疆农村维吾尔族宗教行为分析	蒋力蕴
第8-9期(1997-9, 10)	
数量优势下的恐惧——评亨廷顿第三篇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	李慎之
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	(美)塞缪尔·亨廷顿
美国社会发展中的种族与少数民族问题	马戎
在美国的华人：一部职业变迁的百年史	郑宇
第10-12期(1997-12)【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专题讨论】	
探索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	费孝通
但开风气不为师	潘乃谷
从我所得学术实践谈社会学学科建设	马戎
中国社会学一个值得珍视的学术传统	周星
经济学与社会学：分野与互动	刘世定
汉学人类学的范式危机	王铭铭
人类学：理解与应用	麻国庆
第13期(1998-4-15)	
《云南三村》英文版之“导言”与“结论”	费孝通
田野工作中的文化体验	于长江
维吾尔族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水平考察	蒋力蕴
第14期(1998-11-25)	
与君同销万古愁——两位人类学家的聚谈	费孝通 李亦园

中国文化中的“角色原理”刍议	王处辉
银川市回汉民族居住格局变迁及其对民族间社会交往的影响	马宗保
第 15 期 (1999-3-1)	
温习派克社会学札记(连载之一)	费孝通
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	马 戎
东南亚华族与当地主体民族“剪刀差”现象初探	李 红
第 16 期 (1999-5-1)	
温习派克社会学札记(连载之二)	费孝通
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	马 戎
第 17 期 (1999-9-15)	
温习派克社会学札记(连载之三)	费孝通
关于“民族”定义与民族意识	马 戎
乌鲁木齐民族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	王建基
费孝通先生谈学科建设	潘乃谷
第 18 期 (2000-1-5)	
温习派克社会学札记(连载之四)	费孝通
民族与国家——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	王铭铭
认同与融合：民族社会的发展——对一个多民族山乡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李秋洪
苏联解体后各共和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加高兹个案	Charles King
第 19 期 (2000-3-15)	
温习派克社会学札记(连载之五)	费孝通
族群身份和民族国家：多元文化社会的政治社会学	约翰·莱克斯(John Rex) 王雪梅译
核心与边缘国家中的族群抗争	苏珊·奥扎克(Susan Olzak) 张宏明译
第 20 期 (2000-5-15)	
对第二代华裔及朝鲜美国人中的通婚和种族认同的思考	那兹里·克伯瑞尔 晏琼英译
多元文化主义能解决问题吗？	米切尔·韦凡尔卡(Michel Wieviorka) 杨晋涛译
第 21 期 (2000-7-15)	
俄罗斯，地区民族主义和联邦政治	格雷姆·史密斯(Graham Smith)、关凯译
熔炉，沙拉碗——还是大蒸锅	Shirin Akiner 著、王璇译
第 22 期 (2000-9-15) 【走向 21 世纪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专辑】	
谈谈社会学的教材建设	费孝通
社会学在未来的发展与趋势	李培林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李 强
切实从实际出发建设好中国的社会学	谢遐龄
中国的社会学和社会思想史研究	王处辉
社会学者的双重角色与中国社会学	马 戎
中国家族研究的进展	麻国庆
技术与社会	刘世定
我看中国社会心理学	方 文
20 年文化研究的嬗变：从启蒙到表述	高丙中
中国社会学中的人类学传统	周 星
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	赵旭东
人类学的中国与世界	王铭铭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邱泽奇
当前高等院校社会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马 戎

第 23 期 (2000-11-15)

- 从实求知——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迎新会上的讲话
多民族与多元文化社会之难题 约翰·里克斯 (John Rex) 著、周莉译
民族身份和“异己” Anna Triandafyllidou 著、王卓异译
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 马戎

第 24 期 (2001-3-15)

- 试论中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 马戎
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 (序言) Pettigrew, T.F. 著、任道远译
详析差异, 寻求和谐: 贝利兹内种族、民族和国家的共同建构 Laurie Kroshus Medina 著、高翔译

第 25 期 (2001-8-15) 【潘光旦文集出版座谈会专辑】

- 《潘光旦文集》编辑经过 潘乃穆
学习潘光旦先生的“中和位育”思想 韩明谟
在《潘光旦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邓锐龄
我的三点感想——在《潘光旦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葛兆光
“人文史观”——潘光旦与我们这代人的问题 王铭铭
要学习知识与技能, 但更需要学习如何做人 马戎
宁夏城市回族通婚现状调查研究——以银川、吴忠、灵武为例 杨志娟

第 26 期 (2001-12-15)

- 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 费孝通
民族生存与发展——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研讨班上的讲演 费孝通
在第六届研讨班座谈会上的发言 费孝通
在第六届研讨班闭幕式上的发言 潘乃谷
影响族群关系的政策因素 靳薇
游走在田野与文本之间——Y 村调查琐谈 胡鸿保、姜振华

第 27 期 (2002-2-15)

- 西部开发、劳动力流动与少数民族教育 马戎
广西民族经济心理的跨文化比较 李秋洪
我国族际关系的润滑剂 陆天桥
书评: 评路易莎的《少数民族准则》 王富文著、胡鸿保译, 孟彻理 (Chas Mckhann) 著、陆煜译校

第 28 期 (2002-5-15)

- 对上海社区建设的一点思考 费孝通
跋涉荒野——学会寻找自己的路 大卫·菲特曼、刘灿灿译
有关新宗教和教派的经验研究——实践和伦理的考虑 詹姆斯·T 理查森、马雪峰译
田野工作中的守秘与披露 理查德·米切尔·JR、陈玲译
男性主导情境中的女性研究者——短期研究与长期研究 琼·内夫·格妮、石鑫译
设法让人信服自我呈现——关于进入田野的一些个人反思 威廉·沙菲尔、葛婧译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 朱庆华、王继平

第 29 期 (2002-8-15)

- 对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回顾与前瞻 费孝通
语言政策 科纳 (W. Connor)、张文义译
谓族群性? 保罗·布拉斯 (Paul R. Brass)、马雪峰译
文化整合 唐纳德·N·莱文、熊瑜好译

第 30 期 (2002-11-15)

- 继往开来, 建设 21 世纪中国的社会学 费孝通
回眸七十年 费孝通

- 读王桐龄《中国民族史》 马 戎
民族认同 霍洛维茨 (Donald L. Horowitz) 著、汪澎译
- 第 31 期 (2003-2-15)**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费孝通
试论语言社会学在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马 戎
社会融合 罗伯特·安吉尔 (Robert Cooley Angell)、张 玲译
超越自由主义与少数族群权利的自由主义族群性 埃瑞克·考夫曼 (Eric Kaufmann)、苏 敏译
- 第 32 期 (2003-9-15)**
关于学科建设的一次谈话 费孝通
对于人脑来说, 族群是生物“物种”吗? 弗朗西斯 J. 吉尔-怀特 (Gil-White)、褚建芳译
弗朗西斯 J. 吉尔-怀特文章的评论 马 戎
- 第 33 期 (2003-12-15)**
对族群与种族研究的反思 Martin Bulmer and John Solomos, 梁茂春译
如家庭的一分子: 种族、民族以及美国民族认同的矛盾 Patricia Hill Collins, 黄霞译
国际迁移的跨国化发展: 对隐含的公民身份和文化现象的研究 Thomas Faist, 史江华译
- 第 34 期 (2004-4-15)**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费孝通
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 马 戎
书评:《历史学家的经线: 历史心理文集》(美) 孙隆基著 马 戎
- 第 35 期 (2004-9-15)**
“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费孝通
中国传统“族群观”与先秦文献“族”字使用浅析 马 戎
汉族青少年民族意识形塑的研究——一个对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本的内容分析 栗晓红
- 第 36 期 (2004-12-15)**
《社会学精品原版教材系列》序言 费孝通
中国城市中的族群聚居地经济: 延边的朝鲜族 哈里斯·H·金 (Harris H. Kim)
族群教育的导向和族群分层的趋势 刘卓锋
- 第 37 期 (2005-5-20)**
费孝通教授生平
从昆明的“魁阁”到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马 戎
研究部之灵 杨圣敏
人看我看我们 —— 读费孝通译著 *Earthbound China* 于长江
- 第 38 期 (2006-5-15)**
武陵地区的“堂祭三献礼” 胡鸿保, 林春
影响朝、汉族群关系变迁的因素分析 韩 悦
长江上游水电开发中的民族问题 石 硕
对“民族”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 葛 婧
- 第 39 期 (2006-11-20)**
谈“民族” 费孝通
中国人的种族历史 李济 原著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民族主义 杨奎松
引用文献不能断章取义——关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印度“民族构建”的评价 马 戎
- 第 40 期 (2006-12-20)**
中国与印度: 从人类学视角来看文化边陲 (日) 中根千枝
从化外到化内——鄂尔泰在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 李若愚

多元一体：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的统一	邹汉歌
清代民族“大一统”观念的时代变革	李治亭
第 41 期 (2007-2-20)	
“祖国”的吊诡——“现代冲击”下冲绳身份认同的蜕变现象	林泉忠
从电影《撞车》透视新世纪美国族群关系	赵擎寰
民族平等政策的不平等后果——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点思考	叶晓恬
第 42 期 (2007-4-20)	
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	马 戎
少数民族文化的错位现状与前景思考	常 宝
第 43 期 (2007-7-20)	
费孝通先生在内蒙古的调查研究工作	潘乃谷
论中华文明历史共识的国家认同	王亚南
第 44 期 (2007-9-20)	
论中华国民共同体：渊源、发展和定型	王亚南
南疆维吾尔农民工走向沿海城市 ——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劳务输出调查	马 戎
第 45 期 (2009-12-20)	
民族研究的创新需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马 戎
中文“Minzu” 和中国“各民族”(Geminzu) 的区别与联系	
——理解中国民族关系(ethnic relations)的另一个视角	宁 骚
作为民族-国家基础的公民与族群民族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处在十字路口了吗？	Partha Nath Mukherji
第 46 期 (2008-2-20)	
斯大林是否在民族问题上犯了历史性错误？——关于苏联解体的反思之一	马 戎
普遍的利益诉求还是少数人的诉求——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的调查与研究	杨圣敏
中国地方与族群文化的多元化及其前景	
——兼评杜磊(Dru Gladney) 论文《民族国家是否建构了民族？》	常宝、阳妙艳
第 47 期 (2008-4-20)	
双重国籍：国民认同的危机抑或更好世界的预兆？——对 21 世纪国民认同的反思	Nathan Glazer
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双语教育的实践	马 戎
第 48 期 (2008-6-20)	
新疆南疆地区维吾尔族青少年国家认同研究	王嘉毅、常宝宁
从社会效应看制度安排的必要调整——鄂伦春族个案	何 群
世界各国民族关系类型特征浅析	马 戎
第 49 期 (2008-9-10)	
在湘鄂川黔毗邻地区民委协作会第四届年会上的讲话	费孝通
费先生讲“武陵行”的研究思路	潘乃谷
“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与“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	马 戎
费孝通与“桃花源”	王铭铭
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是什么：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案例	杨圣敏
第 50 期 (2008-12-10)	
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问题——区域差异、职业差异和族群差异	马 戎
弥合民族裂痕，重建联邦大厦——回顾普京执政八年	许 涛
字母拉丁化与土耳其的现代化	曾 涛

第 51 期 (2009-2-10)	
中华民族是一个	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追记抗战初期一场关于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辩论	赵志研
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	马 戎
清代新疆政区变革与城市发展——纪念新疆建省 125 周年	黄达远
第 52 期 (2009-5-10)	
《祖荫之下》的“民族错失”与民国大理社会	梁永佳
关于当前中国城市民族关系的几点思考	马 戎
前秦苻坚的中国观与民族观	李 方
第 53 期 (2009-7-10)	
美国“肯定性行动”的历史沿革	王凡妹
土耳其与“东突”的“不解之缘”	咎 涛
靳薇《援助政策与西藏经济发展》序言	马 戎
第 54 期 (2009-8-10)	
内蒙古草原牧区的蒙汉关系演变及影响因素——以锡盟东乌旗一个牧业社区为个案	马 戎
寻找满族——思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及其影响	定宜庄、胡鸿保
中国历史中的政治、族群与边疆：另一张隐在的面孔	
——兼读狄宇宙、韦栋主编《中国历史中的政治边疆、族群边界以及人文地理》	袁 剑
第 55 期 (2009-9-10)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动西藏社会发展研究	马 戎
青海民国史研究的进入、定位和难题	菅志翔
【书讯】《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沈志华主编	
第 56 期 (2009-10-10)	
苏联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得失	左凤荣
唐朝西域东部异族通婚考论	李 方
外出务工对内蒙古民族混居农村的影响——内蒙古翁牛特旗农村调查	马 戎
第 57 期 (2009-11-10)	
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建设	常 安
疆藏骚乱原因剖析暨新加坡经验的启示	郑永年、单伟
如何思考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建设	马 戎
浑身发麻：不讲“日本汉语”就不能说话？	裴 钰
第 58 期 (2010-12-10)	
多民族国家还是多族裔民族国家？	王 丹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几点思考	马 戎
从现实生存到文化生存——试论小民族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范式	黄 娟
第 59 期 (2010-1-10)	
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	马 戎
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与民族融合	白 皓
以不同方式唤醒民众的国家意识——追记安健和他的《劝滇蜀桂黔诸土司文》	秦 亮
第 60 期 (2010-1-20)	
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王 柯
宪法的民族观	李占荣

西方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几个范式“陷阱”	袁 剑
种族骚乱后，洛杉矶如何恢复繁荣？	丁学良
读《为什么餐厅里的黑人孩子都坐在一起》：兼论对构建和谐族群关系的启示	阳妙艳、常宝
第 61 期 (2010-2-10)【苏联民族问题专辑】	
后苏联民族问题的症结	金 雁
突破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的困局——从读 B. A. 季什科夫的《民族政治学论集》谈起	潘志平
苏维埃联邦政治与族群动员	Philip G. Roeder, 王娟译
第 62 期 (2010-3-10)	
汉藏交融与民族认同	沈卫荣
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与“黄帝崇拜”的族群狭隘性	马 戎
俄罗斯的“族群复兴”：后共产主义秩序中地区领导人的分离行动主义	Daniel S. Treisman, 孟红莉译
第 63 期 (2010-3-25)	
也谈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	沈卫荣
“汉化”还是现代化	马 戎
文化分层下的民族意识构建——再读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	袁 剑
第 64 期 (2010-4-15)	
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	赵鼎新
“排满”革命与国史重建	王春霞
民族国家的观念与中国实践	吴 飞
鲁迅与 20 世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	姑丽娜尔·吾甫力
“援助”与“感恩”	马 戎
第 65 期 (2010-4-30)【清末民初“国族”构建研究专辑】	
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	沈松桥
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	沈松桥
第 66 期 (2010-5-1)	
略论公民权与少数民族权利	范 可
“汉奸”：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	王 柯
论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与“中国”	方维规
第 67 期 (2010-5-15)【清末民初“国族”构建研究专辑之二】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兼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	沈松桥
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	黄兴涛
第 68 期 (2010-6-15)	
民族宗教政策的新疆现实	《瞭望》新闻周刊 王健君
自由战士还是恐怖分子？——探究维吾尔族人民的真实情况	(美国)杜磊 Dru Gladney
第 69 期 (2010-7-10)	
重审“苏报案”	黄 波
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新疆建省”	王 柯
朝廷与藏传佛教	陈 波
失序的吉尔吉斯斯坦——内部撕裂与大国较力中的新国家	咎涛、石晨叶
第 70 期 (2010-7-15)	
“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实质的历史考察	王 柯
清末民初宪政世界中的“五族共和”	常 安

第 71 期 (2010-8-15)

- 对苏联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读萨尼教授 (Ronald Suny) 的《历史的报复》 马 戎
族群政治的制度逻辑——兼评菲利普·罗德的文章《苏维埃联邦政治与族群动员》 王 娟
“左右多元化”最能淡化民族认同多元化: 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与认同之道——印度与南斯拉夫的比较 秦 晖

第 72 期 (2010-8-30)

- 从王朝到民族-国家: 清末立宪再审视 常 安
民族国家的胜利: 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教训 菲利普·罗德 Philip G. Roeder 著, 卢露译

第 73 期 (2010-9-15) 【苏联民族问题讨论专辑】

- 俄罗斯族群复兴的推动者——读丹尼尔·特瑞斯曼的《俄罗斯的“族群复兴”》 孟红莉
区隔化制度的失败和民族国家的胜利——读《民族国家的胜利》 卢 露

第 74 期 (2010-11-1)

- 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的辨析——兼论王明柯、张兆和对“汉”的理解及学界误读许烺光的原因 王红艳
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原教旨主义”: 现实与历史的成因 董正华

【历史小百科】宗方小太郎

第 75 期 (2010-11-15)

- 21 世纪的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分裂的风险? 马 戎
“民族”概念翻译中的难题 郝 瑞

第 76 期 (2010-12-15)

- 瑞士族群治理模式评说——基于“宪法爱国主义”的公民联邦制 田飞龙
从权利保障视角看族群自治与国家统一 张千帆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与现代中国的危机 李勤璞

第 77 期 (2010-12-31)

- 西藏社会发展与双语教育 马 戎
如何开始用比较的视角去思考苏联的族群问题 Donald L. Horowitz 著 袁剑译

第 78 期 (2011-1-15) 【民国民族史研究专辑】

- 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精英: 理解中国从“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进程的钥匙 马 戎
“寻找国家”——清末民国时期蒙古地方精英国家认同的演变与形成 常 宝
满族民族性: 帝国时代的政治化结构与后帝国时代的去政治化结构 关 凯
马麒的身份转换与政治抉择——兼议民国时期地方割据势力的国家意识 菅志翔

第 79 期 (2011-1-31) 【苏联民族问题讨论专辑之二】

- 苏联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 左凤荣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及其教训——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体制的确立与影响 左凤荣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与苏联解体 左凤荣
2009 年国外社会学的族群研究回顾 马戎, 马雪峰, 祖力亚提·司马义, 阳妙艳, 赵蕊

第 80 期 (2011-2-15)

- 共产主义中国之前的国民党、穆斯林军阀和“开发大西北”运动 林孝庭著, 卢云译
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演化及其当代启示 黄达远
新疆城镇发展和双语教育的进程——南疆地区两个专题调研报告 马 戎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邮编: 100871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李健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